



辛亥革命命素世凱



生活書店發行

628.1
795=4

書叢學自年青

凱世衰與命革亥辛

著 翁 方 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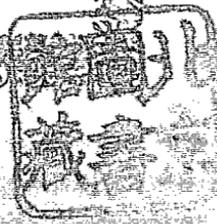
3 0387 8107 0

行發店書活生

月一年七十三國民華中

A 210965

~~圖書分類~~



青年自學叢書
辛亥革命與袁世凱

基本定價每冊一元二角

• 外埠郵費在內 •

著者 黎 乃 遜
發行人 伯 昕
發行所 香港大道中五十四號
生活書局
上海·星洲
特約經售處 聯營書店
漢口·成都·重慶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

(U7)H.1—2000

港 2.20

目次

第一章 革命運動的發展	(一)
一 面臨着末日的滿清王朝	(二)
二 反滿統一戰綫——同盟會的組織	(七)
三 同盟會的革命領導	(二一)
四 席捲全國的反政府怒潮	(二五)
第二章 革命與妥協	(三三)
一 武昌城裏的突發事件	(三三)
二 第二天就妥協了	(三六)
三 人民反滿革命的高漲	(三九)
四 各省響應·各省妥協	(四一)
五 牛鬼蛇神一齊出現	(四四)

六	各省都督府代表會議	(四)
七	建立臨時政府的鬥爭	(四)
八	帝國主義支持誰？	(五)
第三章	袁世凱的竊國陰謀	(五)
一	滿清統治的崩潰與袁世凱的起用	(五)
二	袁世凱對革命黨的一打一拉	(六)
三	和談	(六)
四	逼宮與讓位	(六)
五	爭都	(六)
第四章	大獨裁者與政黨政治	(六)
一	政黨政治的幻像與各黨各派	(六)
二	『責任內閣制』	(六)
三	國民黨的幻想	(六)

四	絕望的反抗·····	(叁)
五	幫聞者的結局·····	(九)
第五章	怎樣上場，怎樣下場·····	(一七)
一	有皇帝權力的總統·····	(一八)
二	黑龍會陰謀·····	(二四)
三	帝制運動·····	(二九)
四	醜劇登場·····	(三五)
五	反袁統一戰綫·····	(三〇)
六	袁世凱之死·····	(三四)

第一章 革命運動的發展

在中國近代史上，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是一個重要關鍵。滿清王朝二百六十餘年的統治至此結束。從此樹起來了中華民國的招牌。但在這塊招牌底下，仍舊是一個不斷混亂的局面，軍閥、官僚、大地主和大買辦竊據了這塊招牌。人民在苦難中生活，而又從苦難中不斷的掙扎、覺醒、戰鬥，繼續來寫中國革命的歷史。

辛亥革命的點火者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侵略的刀鋒是直接對着中國人民的。早在鴉片戰爭（一八四二年）時期，英帝國主義的侵略軍就已經遭受過中國人民的堅決的反抗。到一八九四年的中日之戰以後，中國人民的反抗便隨着瓜分危機的深化與滿清政府腐敗統治的澈底暴露，廣泛展開為全國範圍的革命起義。

滿清政府對外妥協、屈服、不抵抗，對內堅持封建專制的統治，堅決拒絕改革，拒絕進步，完全依靠殘暴的屠殺與欺騙政策維持其搖搖欲墜的統治，結果乃使全國人民的仇恨集中



到這個異族統治者身上。人民的廣泛覺醒與長期鬥爭造成了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形勢。

人民在鬥爭中創造了革命的先鋒隊。一九〇五年，以新興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之一部及知識份子爲代表，組成了反滿統一戰綫的同盟會。舉起了顛覆滿清政府，建立中華民國的大旗。

但是同盟會的領導並不是足夠堅強有力，以領導起一個真正的民主革命。資產階級雖是新興的，然而十分軟弱無能。各團體各階級只是在反滿的目標底下統一起來，他們的想法和行動都預伏着在革命進程中妥協讓步的根子。這個資產階級的領導，從革命開始時就已決定了它的前途。

一 面臨着末日的滿清王朝

帝國主義的侵略競賽刺激了中國的一部份官僚地主商人，使他們感覺到改良軍備與振興實業的必要，從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以後，以李鴻章爲首，從事少量軍需工業與輕工業的建立。這種努力在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的中日戰爭中已被證明是徒然的。帝國主義

各國已經積累數十年侵略，在中國各主要地區建立好侵略據點。築路權、採礦權、內河航行權都已經劃好勢力範圍，分別佔取去了。在各通商口岸，外資工廠林立。民營輕工業在中日戰爭前雖然漸漸增加，然而不能不立即受到帝國主義與官僚統治的變重桎梏。滿清政府的權力僅能用以保護帝國主義的利益，事實上成了帝國主義的代理人 and 阻礙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直接執行者。

這反映到政治上來，在資產階級與士大夫羣中，就發生了兩派主張。一派主張根本打倒帝國主義代理人的滿清政府，重新建立民主政權，這就是以孫中山爲首的革命派；一派主張擁護滿清政府，就滿清政府加以改良，實行君主立憲，這就是以康有爲梁啓超爲首的君主立憲派。

滿清政府對付革命派，從頭到腳採取殘酷的屠殺政策。對於君主立憲派，滿清政府在戊戌政變（一八九八年）時雖也堅決排斥；但到了一九〇五年以後，滿清政府自己也感到危亡在即，就套上假面具，採取欺騙政策，說是要實行『君主立憲』了。

經過一九〇〇年（光緒廿六年）的八國聯軍之役，把滿清政府的弱點完全暴露了，整個

國家臨到了滅亡的空前危機。在這個嚴重關頭，滿清政府無條件地以托庇帝國主義爲其保全政權的方策。而內政則腐敗更甚，苛捐雜稅有加無已，人民生活日益窮困，抗捐暴動在全國各地普遍發生，革命運動因而獲得了廣泛迅速的發展。滿清政府爲了緩和革命危機，並應付士大夫羣的要求，在八國聯軍佔領北京，被迫遷都西安以後，即在西安下令變法，但也只是就『廢科舉，設學校，派遊學』幾件事情上，發佈了一些命令，表示若干除舊佈新的意思，以轉移國人對八國聯軍之役大失敗的不滿。

日俄戰爭（一九〇五年）以後，一班士大夫更以爲立憲是圖強的不二之道，大肆活動。駐法公使孫寶琦，督撫周馥、張之洞、岑春暄等也紛紛奏請立憲。這時康梁仍避居國外，他們所領導的政聞社在國內仍遭受嚴重打擊，被視爲非法的集會結社，但他們却抱定宗旨，不與現政府爲敵，只是向腐敗的專制政府要求『立憲』。國內的立憲黨人則在表面上避去康梁關係，利用他們在各界與各地方的聲譽地位，使滿清政府不便壓迫他們，在各地建立與政聞社聲氣相通的組織：如江浙一帶的預備立憲公會，湖北的憲政籌備會，湖南的憲政公會，廣東的自治會等。他們在光緒卅四年六月更集合豫、皖、直、魯、川、黔各省代表入京，向都

察院呈送『請速開國會書』，以後有張謇、湯壽潛等號召的蘇、浙、皖、贛、湘、鄂、閩、粵、桂、豫、魯、直、遼、吉、黑十六省諮議局代表在上海組織的『國會請願同志會』，以及聯合各政團、商會和海外華僑代表組織的『國會請願代表團』等，發動了四次大請願，改良主義的立憲運動至此達最高潮。

立憲運動的高漲，一步一步明顯地暴露了滿清政府的頑固自私和欺騙拖延政策，而這種士紳的改良主義運動的無效，更推動了廣大人民的情緒轉向革命。但西太后抓緊政權，決心敷衍到底。光緒卅一年（一九〇五年），她宣布設立『政察政治館』，欽派戴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紹英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但當時立憲的聖旨已不足以緩和全國人民的反滿革命情緒了。奉派考察憲政的五大臣由北京起程出國，就在前門車站遇到了會黨份子吳樾的一顆炸彈，強烈地表示了人民的抗議。

第二年（一九〇六年），五大臣回國，因為學到了不少欺騙和壓迫人民的新辦法，也相率奏請立憲。朝廷隨即下詔預備立憲，作了『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的諾言，但須『俟數年後』，『查看情形』再行決定。光緒卅三年（一九〇七年），改『政察政治館』為

「憲政編查館」，各省設立諮議局，以「遵諭旨採各省之輿論，指陳各省利害，籌劃地方治安」爲宗旨。光緒卅四年八月由奕劻等奏呈一個以保障君權爲中心的『憲法大綱』，宣佈以九年爲預備立憲期限，作爲立憲黨人大請願的答覆。事實上，這時滿清政府不但毫無立憲的誠意，而且藉立憲之名在內部展開了排除漢人、建立清一色皇族集權政府的鬥爭。當立憲運動抬頭的時候，漢人中一班大官僚滿以爲他們的機會到了。代表大地主利益的漢族官僚重臣向來矢志効忠於滿清專制政權，現在眼見這個政權已面臨絕境，就想用立憲的形式來削弱那批太不中用的滿洲貴族的政治地位，從而造成他們自己得勢的時代。結果却恰好和他們的願望相反，張百熙、瞿鴻禨、袁世凱等都先後被罷斥，到辛亥三月，皇族內閣也終於在立憲聲中上場了。這種漢族重臣與滿洲貴族間的磨擦，固然是統治集團內部的事情，但漢族重臣因不能如願以償地獲得充分權力而憤憤不平，就使得他們後來漸漸地敢於利用革命運動所造成的機會，取滿清王朝而代之。

滿清政府的腐敗頑固，由於它對實施憲政的欺騙拖延和對人民的屠殺政策而暴露無遺。到辛亥革命的前數年間，滿清政府已經完全成爲孤立的了。

二 反滿統一戰線——同盟會的組織

全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侵略與滿清暴政的鬥爭與思想，逐漸促成了各地知識份子與資產階級的進步團體。這些進步團體中，最主要的有孫中山陸皓東等領導的興中會，黃興宋教仁等領導的華興會，章太炎蔡元培等領導的光復會，以及海外各地的留學生團體。庚子以後，隨着內外危機的深刻化，革命條件日趨成熟，孫中山和他的同志就展開了統一戰綫的活動。到一九〇五年八月，乃在東京成立了統一戰綫的革命組織「中國革命同盟會」，推孫中山爲總理。加盟的人，除甘肅一省兩外，包括了十七省的革命份子。革命運動從此走上一個廣泛發展的新階段。

在同盟會的成立大會中，由孫中山提議，通過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爲同盟會的基本綱領。這個綱領的進步性，誠如列寧所說：「孫逸仙綱領底字裏行間充滿着奮鬥的真正的民主主義，他完全懂得種族革命之不够……直接提出民衆生活狀況問題，群衆鬥爭問題，對勞動者及被剝削者表示熱烈的同情。」

但是同盟會各革命團體雖然都以反滿爲目的，反滿以外的政治意見却並不一致。這在同盟會成立的當時就已經看得出來了。首先是名稱，有人主張定名爲『對滿同盟』，以便明確規定這個統一戰綫的對滿的性質。經過孫中山的解釋，總算把同盟會名稱確定了。後來孫中山提請通過基本綱領的時候，又有人反對『平均地權』，當時僅由於孫中山一派力量最大，才以大多數贊成獲得通過。實際這樣的『通過』是非常勉強的。各種歧異的意見並沒有由此趨於一致。在通過革命綱領同時，却以一種相反的精神製定了一大套『革命方略』。這一套革命方略在思想上有三個最大的特點：

第一個特點就是不廣泛發動民衆力量參加革命，因此也就是不依靠民衆。當時方略所定『略地規則』以『安民』爲主要內容之一。安民局由地方紳士主持，編門牌，發通行證，查戶口，名爲安民，事實上就是用一套老辦法來統治人民。方略中預擬的『安民佈告』中更說得明白：『我國民不必猜疑驚恐，爲士者照常求學，爲農者照常耕種，爲工者照常工作，爲商者照常買賣，老少男女照常安樂居家。』有要參加革命的，如後來武昌所實行的辦法，那就是到招賢館報名或向軍隊投効，聽候錄用。

這是非常明白的，「創立民國」而不廣泛發動民衆參加，不依靠民衆的力量來支持革命和建立革命政權，那就只有跟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妥協，依靠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來建立半封建半殖民地政權。因此革命方略的第二個特點就是不反封建。推翻滿清統治，在客觀意義上固然是推翻了當時的封建勢力在政治上的代表者，但是對於根深蒂固的地主勢力和地方紳士權力一點也沒有想到要加以觸動。「平均地權」的口號是有了，但並不以爲真正實行這口號就非依靠廣大農民起來鬥爭不可；更不以爲在推翻滿清的革命時要實行這口號。當時的革命派，在方略上反而是向封建勢力尋找盟友，如所擬「招降滿洲將士書」號召滿軍將校及士兵反正，不分大奸巨惡，盡以「推誠相與，視爲一體」相許，請其「離仇讐之地位而復爲兄弟」，完全赦免了一切滿清封建軍閥官僚反革命反人民的罪惡。在各地方則以一切政權機關委之「地方紳士」，完全不顧所謂「地方紳士」實際就是封建地主與立憲黨人的總稱，如果真正實行同盟會綱領，這一班人就是「創立民國」與「平均地權」的主要障礙，絕無理由可以成爲盟友的。

革命方略的第三個特點就是不反帝，準備跟帝國主義妥協。當時的革命派固然也有反對

外國侵略的愛國思想，但他們却有一種錯誤的想法，以爲中國之所以被侵略壓迫只是因爲滿清政府不爭氣的原故，所以只要推翻滿清政權，就可以用和平手段使外國侵略者自動減免對中國的一切束縛。方略中的『對外宣言』宣佈承認滿清政府與帝國主義國家間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外債繼續償付，外人既得權利一體保護，僅僅要求外人不援助滿清政府。方略中的軍律更特別規定：『殺外國人，焚拆教堂者，殺！』當然，在策略上孤立滿清政府是必要的。但當時同盟會由於不肯依賴民衆，因而依賴外援，希望能用妥協辦法來換得帝國主義各國的同情，這是和革命精神大相背反的。孫中山在英美法各國的上層活動，以及後來南京臨時政府時期革命黨人希望獲得各國承認之迫切，更證明同盟會的對外態度，決不是策略上的運用所可辯解的。

凡此都足以表現同盟會人士雖然接受了一部份外來的民主思想，而他們所從出身的社會的影響，仍舊是形成他們的思想的老底子。所以民主思想朦朧淡薄，老底子思想則強烈表現在對每一件事情的實際處理上，因而造成了政綱與方略之不同：政綱是革命的、以民主主義爲中心的，方略則是背離革命精神的、僅以狹義的種族主義爲中心的。同盟會人士在其整個

革命活動中執行了他們的革命方略，結果並沒有由此方略達到革命綱領的實現，原因就在於方略與綱領是兩回事，使用這樣一套辦法決然實現不了革命綱領。十三年以後，孫中山在北平鐵獅子胡同寓所病榻上簽字的遺囑裏，有一句「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的話，那意味是十分深長的。

三 同盟會的革命領導

同盟會的革命領導正和革命方略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在辛亥（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以前，各地同盟會和同盟會以外各革命團體所發動的起義不下十餘次。總結起來，可分作如下三類：

第一類是由境外運送軍火及敢死隊到一指定地點起義，如光緒廿一年（一八九五年）興中會廣州之役，光緒卅四年（一九〇八年）雲南河口之役，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黃花崗之役。

第二類是單純的軍隊起義，如光緒卅四年（一九〇八年）熊成基安慶之役，及宣統二年

(一九一〇年)黃興趙聲廣州新軍之役。

第三類是藉人民的反飢餓與抗捐暴動起事，如光緒卅二年(一九〇六年)萍醴之役及次年潮、惠、欽、廉、防城各役。

第一第二兩類的輸入革命與軍隊起義都是不以當地人民爲基礎，不與人民相結合的軍事投機行動。第三類有羣衆基礎，但革命黨方面又缺乏有計劃、有遠見的領導，堅持並擴大革命戰鬥使各地繼起響應。結果都只是冒險突襲，倖圖一逞，終乃不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就以重大犧牲宣告結束。

這些起義在其本來的目的上是失敗的。然而影響所及，則使滿清統治者的殘暴反動完全暴露，使全國人民的反滿革命情緒因之日益高漲。特別在同盟會成立以後，革命黨執行了一個正確的方針，即各省黨人分別回到本省從事工作。當時適值萍醴工飢民暴動，事態不斷擴大，在東京的湘鄂兩省黨人，激昂慷慨，紛紛返國參加革命。雖然萍醴之役很快失敗了，但這些革命黨人以武漢爲中心，仍在湘鄂兩省從事革命活動。

湖北當地的革命黨人本來是非常活躍的。他們爲了運動士兵，大部份都投身新軍，作士

兵或下級軍官。有許多知識份子入營數年之久依然只是一名士兵，亦安之若素。遇到情勢不利，風聲緊急之時，就改個名字，進了另一個兵營。他們長期地在士兵羣中進行着宣傳鼓動工作，散發革命的宣傳品如陳天華所著的通俗小冊子『猛回頭』『警世鐘』等。一九〇四年（光緒卅年）五月第八鎮工程營士兵張難先、胡瑛等與學界黨人呂大森、歐陽瑞華、曹亞伯等發起組織革命機關『科學補習所』，介紹入伍士兵並團結他們。後來科學補習所因黃興、宋教仁等謀於是年十月在湘省暴動不成被牽連，黨人星散，遂告解體。科學補習所解體以後，該所黨人劉靜菴主持美教堂公會附設的閱報室『日知會』，以備有各種新出書報雜誌，遂漸成爲當地軍學各界人士聚會之所，到一九〇六年五月，日知會遂由一個傳布新知的機關正式蛻變爲革命組織，聲勢極盛，日本歸國的黨人即以日知會爲基礎建立同盟會湖北分會。但又因日知會主持人劉靜菴被奸細誣指爲參加萍醴之役的會黨首領劉家運，遂與張難先、胡瑛、殷子衡等九人被捕入獄，造成一大血案，日知會亦告瓦解。從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〇年爲湖北黨人自由活動時期。這期間先後有『湖北軍隊同盟會』『羣治學社』『振武學社』『文學社』等等組織，和『商務報』『大江報』等報紙的出版。在辛亥革命前，『文學社』

這一個團體正在這個溫和的名稱下作着革命準備工作。此外還有焦達峯等一九〇七年在東京發起的『共進會』，亦於一九〇九年在漢口設立分會，專以聯絡長江各省會黨爲職志，與文學社同爲辛亥革命前在湘鄂兩省策動起義的組織。經過這些革命組織的積年的努力，他們不僅在新軍和會黨中迅速發展，而且逐漸伸展到中下層羣衆中去，爲後來武昌的事變準備了不同於各地屢次起義的條件。

但革命黨在各地策動革命，都是各自爲政的，因此革命條件在各地迅速成熟的結果，轉使同盟會的中央領導遠落在客觀情勢後面。黃花崗之役失敗以後，同盟會領導份子的意見是極不一致的。東京同盟會本部和在香港的黃興等主張繼續用全力經營南部，先佔領廣東作根據地，師法太平天國，經廣西、湖南、湖北、河南直取北京。宋教仁、陳其美、譚人鳳等則主張在長江方面作捲土重來之計，離港赴滬組織『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始則以策動兩湖革命運動爲主要目標，繼則因四川發生保路風潮，民情憤激，又擬借四川爲根據地；同時還想從事中央革命，以短少時間，推翻政府，奪取中樞，號令各省。孫中山在美國，則主張各省連合，一致發動。在武昌起義前一星期，黃興在港因得居正關於湖北情勢的報告，在他

寫給馮自由的信裏，又同意「以武昌爲中樞，湘粵爲後勁，甯、皖、陝、蜀亦同時響應」爲「大事不難一舉而定也」的好辦法。總之，都是跟在客觀情勢後面跑，和以前專用輸入方式發動革命的時代完全兩樣。——以前是不顧羣衆而硬幹，現在是羣衆起來又追不上。

四 席卷全國的反政府怒潮

在革命運動前面奔騰着全國人民的反政府怒潮。滿清統治者的窮兇極惡的搜刮政策與媚外政策不僅帶來了國難，而且帶來了空前的飢荒。一九一〇——一一年江南各地餓殍載途，農村普遍破產。一九一一年六月湖南米荒，富商乘機屯積居奇，著名劣紳葉德輝、王先謙等反對舉辦平糶，在長沙激起了震動中外的大規模搶米風潮。河南、安徽、江西、廣西各省同時在不斷的抗捐民變之中，顯示了全國工農階級與滿清政府的尖銳的對立。

由於滿清政府出爾反爾的工礦鐵路政策，又使地方與中央的對立，地方的資產階級地主階級與政府的對立隨之尖銳起來。在一九一〇——一一年先後爆發了直隸、山西、河南的煤礦風潮，山東的沂水金礦風潮，雲南的七縣礦山風潮，蘇浙的滬紹航權風潮，東三省的收回

主權風潮，川、鄂、湘、粵的爭路風潮。其中爭路風潮是直接引起革命的導火綫，爲革命前夕一次最大的風潮。

爭路風潮起於鐵路國有政策。原來粵漢、川漢鐵路早於一八九八年由盛宣懷的鐵路總公司與美商華美合興公司訂立合同，借款美金四千萬元，將築路權讓予美人，美人僅築三水一段十五里，即將大部份股權轉讓比利時人。一九〇五年，湖廣總督張之洞以鐵路收入一年比一年大，倡議廢約，收歸自辦，各省督撫紛紛贊成，朝廷亦隨請隨准，一時設立公司承辦鐵路者有十三省之多。粵漢川漢兩路收歸自辦以後，官方因缺乏財力，改採官督商辦方式，在四川、湖北、湖南、廣東四省募集民股，並由官廳在稅收項下附抽租股、米捐股、鹽捐股、房捐股，於是四省紳商地主都成了執有鐵道股票的股東，川粵兩省股款已收足一半以上，較少的如湖南亦達三百餘萬元。粵漢路早已開始修築，川漢路宜昌萬縣一段亦已興工。雖然行政管理和其他政府機關一樣沒有效率，一樣貪污虛糜，開辦多年，一條路也沒有築好，但且拖且辦，一般固已司空見慣，沒有話說。到一九一一年一月，盛宣懷繼唐紹儀爲郵傳部尚書（同年五月皇族內閣成立，改稱郵傳大臣），正值滿清政府大事鋪張實行新政，盛宣懷與度

支大臣載澤迎合內閣總理大臣奕劻推行新政的意旨，在「利用外資開發實業」的名義下，先後成立了三筆大借款：

三月，由郵傳部與日本正金銀行成立鐵道借款日金一千萬元；

四月，由度支部向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成立幣制實業借款英金一千萬鎊；

五月，由郵傳部向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成立漢粵川鐵道借款英金六百萬鎊。

在這三筆借款成立和談判的同時，盛宣懷爲了投合載澤的皇族集權的意旨，建議以借款爲資本，實行鐵道國有政策。五月九日即由載澤頒旨宣布：「幹路均歸國有，定爲政策。所有宣統三年以前各省分設公司，集股商辦之幹路，延誤已久，應即由國家收回，趕緊興築。除枝路仍准商民量力酌行外，其從前批准幹路各案一律取銷。」旋即命端方爲督辦粵漢川漢鐵路大臣，下令停止各省徵集商股辦法。並由郵傳、度支兩部公佈收回路股辦法：鄂湘兩省照本給還；粵省發還六成，其餘四成給無利股票；川省路股實用之款給國家保利股票，餘款或附股或興辦實業，另行規定，不得由股東收回，其由經手人虧倒之款，政府概不承認。這一來，就激出了有關各省的風潮。

湖南的紳商地主首先提出反對。天天聚集諮議局開會，爭相發表抨擊政府的演說，認爲已有之股不收，反大借外債，喪失國權，情緒激昂萬狀。湘撫楊文鼎不願強力壓制，乃代諮議局奏請暫行照前辦理，以平民憤，奉旨嚴行申斥。

湖北商繼起反對，革命黨人詹大悲亦參加其中，並以『大亂者，救中國之藥石也』爲題著論發表於大江報。總督瑞徵卽逮捕詹大悲，並查封大江報，於是人心愈益憤激，數千人齊集諮議局開會，到會的商人和士兵甚且有人斷指痛哭，大呼救國，當場公推密昌埜、張伯烈、劉心源、夏道南等督京請願，要求收回成命。密等在京坐守郵傳部大門，不飲不食三日三夜。

廣東巡撫岑春煊則一開始就採取高壓政策，粵路股東黎國廉等倡議反對鐵路國有，立即逮捕下獄，並禁止廣州各報刊載反對言論。粵路大股東陳席儒、陳賡虞、楊西巖等被迫逃到香港組織『粵路股東維護路權會』，致電各方極力抗爭。當時革命黨人陳少白所主持的中國日報及其他港報一致抨擊岑春煊，盡力援助股東方面。岑春煊卽下令禁止香港各報入境。

在同時並起的爭路風潮之中，四川是鬧得最激烈的。四川代表劉聲元在北京，兩次向攝

政王載灃告御狀，都被門役阻擋，乃跪在地安門外，等候載灃，攔輿遞呈，被捕送步軍統領衙門訊究；剛放出來又向奕劻上書，最後被判押解回籍，旅京川人結隊哭送，造成悲壯的印象。在四川省境以內，事態就更嚴重，風潮由省城擴展到各縣，由請願演變到武裝暴動，和革命起義連接爲一了。原因是四川省區廣闊，人口衆多，集款數目也最大，紳商地主階級都因租、米、鹽、房捐稅的抽收，成了握有大量鐵道股票的股東。一旦收歸國有，改借外債，人心頓感失望，加上官方視人民如仇敵，終於激起各階層人民參加反抗的行動。

滿清宣布鐵路國有以後，川省民情憤激，諮議局議員本來都是當地紳商地主階級人物，首先起而力爭，繼之在成都及各州縣即紛紛出現「保路同志會」的組織。署理川督王文也和湘撫楊文鼎一樣，深恐引起變端，一面通令保護保路同志會，一面代諮議局奏請暫緩接收鐵路，結果也同樣奉旨申斥，並且因此革職，另派趙爾豐繼任川督。當時人心，雖然憤憤不平，却還害怕背上一個「反抗朝旨」的罪名，不敢作過於激烈的表示。到八月間，川路總理李稷勳見鐵路國有政策勢在必行，爲了討好中央，親自晉京請示，郵傳部即以宜夔路工責成李稷勳悉心主持，所有工項准仍由川款開支，並由郵部咨文川督轉飭川路總公司知照。這個

事件發生以後，使四川人更感憤慨。

八月廿三日，成都保路同志會開會，決定具呈川督代奏，嚴厲攻擊盛宣懷，同時散發傳單，通告全省罷市，拒繳厘稅雜捐，拒抵股息。爲了表示並非蓄意反抗朝廷，保路同志會通令居民一律在門口供奉『大清德宗景皇帝之神位』，又從德宗的一道上諭裏面引用了『庶政公諸輿論』，『鐵路准歸商辦』兩句作爲他們的口號，分貼在牌位的兩邊，家家戶戶舉哀號哭，使這個運動帶上濃厚的擁護君主立憲的政治色彩。

趙爾豐怕事情鬧大了，與將軍玉昆聯名奏請川路暫歸商辦，又奉旨申斥。端方且由湖北奏劾趙爾豐庸懦無能，敗壞路事。到八月底，滿清政府即諭派端方由鄂統兵入川查辦。趙爾豐因察知朝廷決心使用武力鎮壓風潮，便於九月六日乘鐵路公司股東會開會，聲稱『北京有好消息，立候磋商』，傳見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羅綸，股東會會長顏楷、張瀾和保路同志會會長鄧孝可等五人。沿途武裝軍警戒備森嚴，市民大駭，紛紛尾隨監視。蒲等一進督署，趙爾豐立即宣布蒲等謀反，傳令處死。旁聽羣衆紛紛跪地求情，將軍玉昆恐怕當場行刑，激起反抗，亦力請暫時拘押。這時從外面擁到督署的羣衆愈聚愈多，趙爾豐暴怒起來，下令軍警

開槍驅逐，站在前面的當場死傷多人，站在後面的便如潮湧一般四散奔逃。把守督署外面各要隘的軍警見裏面向羣衆放槍，也跟着放槍，追擊那些手無寸鐵的羣衆。一時哭聲震天，整個成都陷入大屠殺恐怖中。

這個慘案激怒了全四川的人民，把事件推到立憲黨人預期以外的高峯。暴動首先在新津發生。新津保路同志會領導當地民衆殺了縣官，佔了縣城。各縣武裝民衆紛紛向新津集合，新津成了暴動的 centre。趙爾豐先派新軍去打新津，但是新軍毫無戰志，有的還投到民軍方面去了。新津打不下來，各縣保路同志會又相繼起義，並由東西兩面向成都進軍，圍攻成都。趙爾豐被迫集中軍隊死守成都，相持一個多月，自榮縣、威遠、犍爲以西各縣，由於防務空虛，全被武裝民衆佔領了。

在成都慘案發生以後，滿清政府尙嚴令趙爾豐督率新舊各軍相機剿辦，等到暴動擴大，發覺事態嚴重，電令趙爾豐『妥慎處理，開誠勸導』的時候，十月十日（陰歷辛亥八月十九日）晚上，武昌新軍工程第八營的槍聲就響起來了。

第二章 革命與妥協

面臨着嚴重革命危機的武昌，一個突發事件促成了起義。事前當地革命黨所預定的起義日期、時間、計劃都沒有合上事件發展的脚步，情況跟着每一個臨時的事件發生變化。

由於滿清官吏的顛預和張皇失措，起義士兵在起義的當天晚上佔領了武昌。

沒有任何實際的領導。但是在同盟會所預定的革命方略影響下，在第一天舉行的革命行動後，第二天革命派就進行拉攏反革命的封建軍閥、官僚和立憲黨人，跟他們妥協，並且把政權交託給他們。

各省響應，各省妥協。各省的反革命的封建軍閥、官僚和立憲黨人都做了都督，做了政權的接收者。

人民被禁止翻身。可是各種各色的政客却一齊翻身了。革命軍剛剛把腳站定，政客們就組織了各黨各派，紛紛活動起來，並且參加了上海和武昌兩個中心的組府鬥爭。孫中山的逃

國暫時穩定了這個鬥爭。各都省督府的代表選舉他爲臨時總統，在南京建立了臨時政府，然而他們却早已準備和袁世凱妥協，並且同時和袁世凱進行妥協談判，準備把孫中山的總統位置向袁世凱換取清帝退位。

孫中山的悲哀是在他的新舊擁護者中間陷於孤立。孫中山在民國初年的命運，完全在革命過程中給決定了。

一 武昌城裏的突發事件

武昌起義是滿清統治者白色恐怖底下的一個突發事件。關於這個突發事件，有着各種不同的歷史記載。這些記載大抵都以身歷其事者的口述爲根據，各人所見不同，記述者又各有立場，詳略不一。下面的敘述是比較了多種記載寫下的。

武昌起義的準備是從響應黃花崗之役開始的。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陰歷三月二十九日）廣州暴動失敗，武昌響應暴動的計劃取消了。但是廣州暴動鼓舞了全國的人心，奮鬥了近十年的革命黨人因此加強了起義的心理準備。這年八月底，四川爭路風潮已經鬧得舉國

震動，端方奉命帶兵入川以後，湖北遍傳着四川已被革命黨佔領的消息。湖北革命黨人認爲鄂軍西調，武漢空虛，便亟謀舉事。九月二十四日革命黨人開會，決定十月六日（陰歷八月十五日）舉事。消息傳到新聞記者耳裏，就把這個日期登在報上，官方戒備十分嚴厲。革命黨人準備不及，已預定延期到十月十六日。但在十月九日忽然又生意外。黨人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劉公的寓所裝置炸彈，失慎起火。巡捕到來，孫武從後門逃出，捕去劉妾李清貞及孫武姊丈劉覺卿，所有名冊文件全被搜去。同時又在武昌張廷輔家捕去黨人彭楚藩、劉堯激、牟洪勳等數十人。一時風聲緊急，草木皆兵。這天下午六時，革命黨人以事機迫切，又臨時發出命令，改於即晚十二時舉事。發出這個命令以後，革命黨首腦的人員即被捕去一批，餘人逃走一空。舉事命令亦以軍營學校禁人出入，無從送達，十月九日晚間終於又在恐怖氣氛下寂然度過了。

十月十日清晨，湖廣總督瑞澂下令把前一天逮捕的革命黨劉堯激、彭楚藩、楊洪勝等三人提出來在督署門前斬決。同時下令緊閉城門，禁止出入，按照名冊，繼續搜捕黨人。一時人心惶惶，謠言大起。有一班平日掛虛名的假革命黨，這時候紛紛動搖起來，竟向官方告密

說某處有革命黨多少人，某學堂某軍營有多少人。又傳說瑞澂確已派遣巡防營到各處圍搜，這個難逃，那個不免，以至平日與革命黨人有杯酒之歡一面之緣的人也慄慄不安起來。

士兵們被禁閉在兵營里，無法與營外同志通聲氣。不斷的聽說各營長官都奉到命令認真搜捕營內革命士兵。他們全是本省土著，年貌籍貫，保人底冊，一一有案可稽，無可逃避。這時候除了挺而走險，死里求生而外，已經沒有任何辦法了。

夜晚七點鐘。工程第八營後隊排長陶啓勝巡查營房，與該排士兵程正瀛及該排副目金兆龍發生衝突。陶啓勝被猛擊倒地。正在一片喧鬧混亂之中，該營左隊士兵方興偷倫在外向營房拋了一顆炸彈。大呼：『集合！革命！』後隊正目熊秉坤即率衆趕出。該營代理管帶阮榮發及右隊隊官黃坤榮、司務長張文濤拔刀阻止，立被砍殺。其餘軍官見勢不佳，紛紛逃避，衆士兵即將營內槍械奪取一空。但他們事前沒有計劃，也沒有推定的起義首領。奪得槍械以後，仍彙集在營房里，不知道下一步應該怎樣行動。當時左隊司書生周定原提醒起義士兵，說既已發難，應即速佔領楚王台軍械局。這才由熊秉坤率領衆士兵一哄跑到楚王台。

當晚負責守衛楚王台的是該營左隊隊官吳兆麟。吳爲日知會老革命黨人，日知會失敗以

後沒有參加革命活動。楚王台守兵羅炳順馬榮等見本營起義士兵來到，即放槍響應，開門迎接。吳兆麟聞得槍聲，一驚之下，立即逃匿，軍械局遂告佔領。該營士兵不到三百人，到了楚王台以後，已經八點鐘，其他各營還不見動靜，十分着慌。當由熊秉坤分別派人促請革命黨員較多的各營立即響應。九時後，響應起義的各營官兵相繼到達。羣龍無首，議論紛紛。當時三十標代表張鵬程見到這個情況，厲聲大叫說：『這樣長守楚王台，一到天亮，我們都完蛋了！應該立即進攻督署，先把瑞澂殺了！』起義官兵一呼贊成，當即分路出發。但以部隊雜亂，又缺乏指揮，屢攻屢敗。而響應起義的士兵愈聚愈多，方面愈擴愈大。正惶急間，守兵汪長林在楚王台西南城下搜索到吳兆麟，即將吳帶到楚王台。吳兆麟平日頗為一般官兵所信服，他既出來，即被推為臨時總指揮。吳堅辭不就，經衆官兵懇求他爲大眾作主，表示服從，才開始執行職務。十時卅分，吳兆麟下令割斷電綫，重新分路進攻督署。

時當深夜。總督瑞澂聽到砲火猛烈，嚇得心驚胆落，不能自主。統領陳得龍說：『卑職保護大帥。』瑞澂說：『砲彈利害得很，要是落一顆下來，可不得了！』不一會，果然一顆砲彈飛來。瑞澂說：『往那里逃？』陳得龍說『到兵船上去。』於是瑞澂即率兵一排，打破

督著後牆，逃登兵艦楚豫號。滿州官鐵忠、連甲等見總督逃了，也趕忙跟着逃上楚豫號。第八鎮統制張彪藏在家里，緊閉大門，不敢動彈。到黎明時候，見大事已去，也逃了。二十混成協協統黎元洪初時爲鎮壓起事，親自坐鎮第四十一標第三營，殺了由吳兆麟派到四十一標送信的革命黨一名，終因砲火猛烈，連夜逃到黃土坡劉文吉家閉門不出。長官盡逃，電綫又被割斷，未嚮應各軍或因未奉命令，亦不了解情況，不敢動；或因內部不穩，而不能動。城內遂無軍隊與起義士兵爲敵。天未明時，起義士兵已佔領督署。武昌城內外各學校及各營留守部隊紛紛歸順，武昌就全部爲革命黨佔領了。

起義前一天晚上，同盟會領袖孫中山在美國剛把數日前黃興由香港發給他的一封密電譯出，獲知武昌新軍準備起義，要求匯款接濟。因爲籌款困難，他正打算覆電黃興，請其制止新軍起事。第二天上午十一時，打開報紙來看，才知道「武昌爲革命黨佔領！」所以他說：「武昌之功乃成於意外。」

①：「鎮」相當於現在的師的編制。

②：「協」相當於現在的旅的編制。

但這並不能完全說是「意外」，這表現着，革命羣衆在沒有領導的情形下，竟也做下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

二 第二天就妥協了。

醞釀了十年以上的，無可避免的，必然要發生的一次革命，在一樁突發事件上展開了。在此以前，最迫切的問題只有一個。這就是：怎樣發動革命？當革命已經開始，並獲得了初步成就以後，隨着出現的問題就有兩個。一個是：怎樣鞏固勝利並貫徹打倒舊政權的目的？另一個是：怎樣在革命軍佔領區內建立新政權？要貫徹打倒舊政權，就必須建立新政權。建立新政權成了同樣迫切的事情。

前一天晚上進攻督署，奪取武昌的總指揮是事件發生以後臨時推定的。現在要建立新政權仍舊是一個突發性質的事件，祇好臨時推定。由誰來推定？推誰？『創立民國』，應該依賴人民，應該根據人民的意志和力量。革命黨在這時候就該根據人民意志，發動人民力量而建立革命政權。但當時的革命黨沒有依賴人民、讓人民組織起來的思想，却是『先天』地已

有着妥協的思想，依靠封建勢力的思想。滿清政府中的反革命派不願意跟革命黨妥協，革命黨甚至強迫他們妥協。在這種情形下，開始了起義第二天建立軍政府的工作。

起義第二天上午，前一晚上領導進攻督署的總指揮吳兆麟邀請各機關革命同志，城中紳耆父老和諮議局議員於是日下午在諮議局開會，進行組織軍政府。當時得到一個報告，說拿獲黎元洪護兵一名，他證實黎元洪尚在武昌城內。於是吳兆麟就想到挾持黎元洪出任都督，依賴黎元洪的資望以號召各省起義。當即派馬榮和程正瀛等率兵一排，到黃土坡包圍劉文吉住宅，把個穿着便衣，嚇得面如土色的黎元洪從內室搜了出來，帶回楚王台。吳兆麟非常禮貌的接待了他。但是黎元洪對吳兆麟說：「你爲什麼要革命？這是要全家誅戮的事！」吳兆麟答說：「事已至此，只好請統領出來維持大計。」在下午的會議席上，吳兆麟就提議公舉黎元洪爲湖北軍都督，諮議局局長湯化龍爲湖北省民政總長。

當時的情形真是所謂「革命尙未成功」。起義的革命群眾因爲獲得了初步的勝利，信心遠較前一天堅強；但他們的領袖却已在向舊勢力進行着可恥的妥協。而黎元洪一流守舊的人物却必須革命黨佔了決定優勢才肯和革命黨妥協。當會衆鼓掌歡迎他出任都督的時候，他

是堅持不肯妥協的。他再三說：『莫害我，莫害我。』一杖長槍威脅他說：『你是滿奴，本來該殺！現在不殺你，反舉你作都督，你還不答應，我就把你殺了！』黎元洪這才沒有作聲。以後兩天一直被禁閉着，既不答話，也不吃飯。革命黨在外面不斷用黎元洪名義出佈告發通電，黎元洪却仍舊『好似作新姑娘態度』。十月十二日十三日漢陽漢口先後光復。十月十三日又有兩個感到不耐的革命黨人跑去用手槍逼他下決心，不盡忠民國就盡忠滿清。黎元洪這才說：『你們再不要如此激烈，我決心與你們幫忙就是。明天叫個理髮匠來把我的辮子剃去好了。』一直到十月十七日，各國宣告中立，革命軍又在漢口打了一個勝仗，黎才熱心出來祭告天地，宣誓就職。

當時被推爲民政總長的湯化龍轉變最快。卽席發表演說，表示『事已定局，自當盡死効命，共圖勳名。』

這就是起義以後湖北革命黨人推戴出來負責軍事和行政的兩位首長。一個是封建軍閥，一個是立憲黨人。都跟革命運動毫無關係，而且原先是反對革命的。在革命黨全面妥協政策下，他們跟革命黨妥協了。於是起義第二天在武昌建立起來的第一個新政府就從此確定爲革

命黨，封建勢力和立憲黨的聯合政府，立即以黎元洪名義發布各種文告，一方面對滿清政府申罪致討，一面告誡人民，『須知爲國復仇，並非許民作亂』^①。這些文件表現這個聯合政府不但在組織上以封建勢力和立憲黨爲主體，在思想上也是一樣的。在反滿革命初期，革命黨起着重大的主導作用。到各省紛起響應，『事已定局』的時候，革命黨的主導作用逐步減弱，而封建勢力與立憲黨人的就主導作用逐步加強了。

革命黨主導作用的減弱，在後來隨着整個局勢的發展表現出來。當幾個早已流亡在外的湖北革命黨主要份子於二十三日以後陸續回到武昌的時候，爭權奪利的活劇立即出現。武昌招賢館的住客本來十分之九是乘着革命高潮搶先出頭的投機份子，其目的在升官發財，其手段在逢迎阿諛。這些人通通變成了軍政府幾位大員互爭雄長的資本。軍務部三武：孫武，蔣翊武，張振武的各懷猜忌，各自擴充實力，實爲軍政府各機關互相傾軋的始作俑者。

由於軍政府內部怪象百出，起義不久，武昌就流行一句話：『革命軍起，革命黨消。』

① 見『宣布滿清罪狀檄』。

到了一九一二年二月，滿清王朝快要結束了，一班革命黨人就都自以爲是豐功偉績的元勳，愈益放縱。當時黎元洪致電南京臨時政府及各機關說：『不意專制尙未盡除，而假共和以濟私圖之事時有所聞。或假之以謀權利，或假之以報私怨，或假之以蹂躪商賈，或假之以損人權。種種怪狀，人道何存？是又豈起義時我同志始願之所及哉！』當時外文報紙評論這種現象說：『各省夙以志士自命，念切同胞者，大半染驕奢淫佚之習，與滿清當道故態，有過之無不及。』由此可见，革命黨不但在起義以後就和封建勢力的官僚軍閥集團妥協了，而且大部份加進了官僚軍閥集團，當然也就無從發生什麼主導作用了。

三 人民反滿革命的高漲

十月十日夜間起義進攻督署的士兵，合計步、砲、工、輜及測繪學校學生不過二千人，較之當時武昌城內外滿清軍力相差遠甚。但滿清政府的各級機構業已腐朽到不堪一擊，起義士兵遂得以二千人一夜之間的突襲，即開始了結束中國二千年來帝王統治的偉大革命。

這中國最末一個王朝的滿清，不但自身腐朽，而且以種族壓迫和殘暴統治贏得了全國人

民的仇恨。革命軍義旗一舉，就立刻獲得了廣大人民的狂熱的擁護。儘管革命黨在起義第二天就開始找封建勢力成立妥協，但打倒滿清王朝却是當時人民的一致的要求。

起義士兵的純真的革命精神和他們的自覺的紀律，使人民敬愛他們。從十月十日天黑到十一日正午武昌全城遍樹白旗，他們一直空着肚子戰鬥。雖然異常疲困、飢餓，但是沒有一個騷擾人民。工程營伙伙奉命陸續作飯送各部隊接濟，伙伙亦特別奮發，往來奔走，不覺其苦，全軍感激。一片相親相愛之情，使士氣爲之振奮。

到十一日正午，前一晚上未響應的各軍歸順以後，合起義士兵不過四千人（當時武昌軍隊有八千人，半數逃散）。十二日軍政府開會決定擴軍四協。十三日起在武漢附近招兵。人民踴躍參軍，五日即告募足。後起者仍源源湧到，以至軍政府不得不出示停止招募。

這些新兵全是武漢附近的工人、農民和散在田間的退伍士兵。當時清兵業已開到漢口以北，但士兵和人民都不怕死，充滿着對滿清和漢奸的仇恨、怨毒和輕視。十月十六日民軍新兵即奉調到劉家廟前線，迎擊劉家廟以南之敵。在清軍砲火猛烈射擊下，民軍因缺乏訓練，不善利用地形，行動遲緩，死傷甚衆。但到下午四時左右，革命軍砲隊轟倒剛開到劉家廟附

近的清軍兵車一列。革命士兵和附近人民一聲喊殺，士兵勇猛衝鋒，老百姓拿了鋤頭扁担跟着追上前去。火車內清兵在死傷枕藉中爭向窗外逃命。前線散兵礮的清兵見後面大軍潰逃，亦向後退却。革命軍民一直追擊到三道橋，清軍逼退到瀋口，打了第一回合的大勝仗。

由於革命方面的軍事指揮者只知以弱勢武力與清軍在陣地上爭持，僅僅認爲民衆在旁喊殺助威爲可用的民氣，而不知依賴民力，普遍的組織民衆多方面支持戰爭，漢口終於在十一月二日全部失守。漢口失守是武漢攻守戰中最大的悲劇。漢口紅十字會醫生王培元，自戰地致函上海該會理事長沈敦和敘述民軍作戰情況，一方面說民軍之勇：『民軍勇往直前，誓死不同。出隊後徒步三四日，忍餓蜷伏，必欲達其目的而後已。及受槍後，忍痛前進，不肯就醫。及經紅十字會援救拾入醫院後，神經錯亂，尙不忘戰爭。槍傷未愈，力求出外，因之傷口復發，終至不治。』另一方面，又說到清軍燒殺之慘：『官軍逢人便殺，積屍遍地。懸揣死亡之數，約計五六千人之多。……受傷兵士，呻吟道側，臥不能起，飢寒交迫。苦無生理時，野狗狂噬啖肉，傷兵無力抗拒，慘狀至不忍睹。已斃之屍及死馬，堆如土阜。蒼蠅、野狗、飛雀相率聚食，殘骸遍地，臭氣四達。』漢口災民致上海商會函說：『初十以後，（滿

清方商的)馮軍統國璋縱令軍士放火焚燒，肆行搶劫，並不准保安會救火。有救火者，當被槍斃三人。連燒三晝夜，自橋口以至蔡家巷，統計不下數萬家。該處爲漢口最繁盛之區，其間財產，都係廿一省之客民居多，乃均一焚而無遺。且傷者傷，死者死，凡老幼婦女之被槍斃焚燒者殆不可以數計。」

清軍在漢口燒殺之慘，更使婦孺皆知「滿人不好」。到漢陽失守的時候，清軍一到，當地人民就都走避一空，除極少數漢奸以外，無論何人不助清軍，以至漢口漢陽無一人力車上街，襄河及大江兩岸，上自金口，下至陽邏，帆船絕跡。而一聞民軍各部隊派人到四鄉招募新兵，民衆即踴躍參軍，男女老幼紛紛向招募人員打聽消息。聞勝則喜，聞敗則恨。他們的喜怒哀樂，都在民軍一邊。

全國人民對滿清王朝的毒恨是武昌起義以後壓迫滿清王朝不能不宣告結束的決定因素。南京學生參加進攻南京的戰爭，還有一部份由文晉介等率領參加武漢之戰，在猛烈炮火下，徒手奪取清軍機關槍。在南京戰爭中，蘇浙兩省派出的敢死隊，甚至有婦女參加在內，爭先與清軍決戰。在未經戰爭的各省，有距離省市較遠的村落，聽說省城準備響應，不管省城究

竟定於何日懸旗反正，早已自動懸起民國的新旗了。

不但全國人民自發的參加反滿革命，未經訓練的民軍亦奮不顧身英勇作戰，清軍中下級軍官和士兵中，也有同情革命的。即使在清軍佔領了漢口漢陽雙方同意暫時停戰以後，清軍內部仍醞釀着響應革命，暗中不斷派遣代表向民軍接洽，準備一旦戰端再開，即反戈相向。列寧的批評是正確的：『如果沒有民衆的偉大精神和革命的高漲，中國民主派就未能推翻中國的舊制度，就未能爭得共和國。』

四 各省響應·各省妥協

武昌起義十天以後滿，清皇帝的統治就開始土崩瓦解了。自十月廿二日湖南新軍起義至十一月十一日海軍歸順民軍，爲時不到一月，除直隸、河南、山東及東三省以外，全國各省都已先後脫離滿清政府，宣告獨立了。

事變的發展有如是之迅速，全國人民的沸騰的革命高潮是一個大背景。在這個大背景底下，有兩個使事變迅速展開的因素。

其一是各地新軍叛變。自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黃興趙聲運動廣州新軍起義以後。同盟會的活動主要的以滿清軍隊爲目標，黨人紛紛從軍。新軍士兵大都是破產的農民、手工業者 and 游民，對滿清政府充滿着仇恨。他們很快就接受了反滿革命的思想，代替會黨成爲革命的主要力量。在武昌起義以前，各地軍隊曾多次發生叛變事件，滿清官吏知道軍隊靠不住，竭力防閒。但是防閒的手段亦僅止於消極的不發槍械子彈，並沒有進一步肅軍。因此革命份子仍得潛伏在軍隊裏面。到武昌起義以後，有許多省份爲了鎮壓革命黨，不能不出動軍隊，不能不把槍械子彈發給士兵，如陝西、山西、雲南就是這個情形，士兵一經領得槍械，就立即叛變了。各地滿清官吏唯一賴以維持統治的軍隊變成了面對面的敵人，除了逃亡就只有束手待縛。由於新軍叛變，陝西、山西、安徽、廣西都在一夜之間，兵不血刃，即宣告獨立；湖南僅殺西路防營管帶黃忠浩等四人，山西僅殺巡撫陸鍾琦一家四口。由新軍就地起義引起較大規模戰鬥的僅雲南一省。十月三十日雲南新軍在蔡鈞、李根源、羅佩金率領下起義，苦戰兩晝夜，到十一月二日昆明城才逐漸安定下來。

事變迅速發展的另一因素，是各地富紳巨賈害怕激烈的革命行動將引起損失，以及立憲

黨人和滿清地方官吏的見風轉舵。安徽、貴州、江蘇、浙江、廣西、福建和廣東的獨立，都先由諮議局的立憲黨人和紳商各界人士向當地督撫請願。他們知道滿清大事已去，革命黨躍欲動，遲早必將舉事；所以就搶先一步，勸告當地政府自動宣告獨立，由他們公推現任督撫繼續作民國的「公僕」，再推舉幾位立憲黨人，紳士大爺和平日在當地做革命活動的黨人參加政府工作，革命就算成功了。而革命黨人竟也認爲請願乃是促請督撫向革命「投降」，以爲這是一條捷徑，跟反滿的目的毫無衝突。於是他們跟隨在立憲黨人和富紳巨賈之後，也走上了這條捷徑。督撫看到「投降」仍舊可被擁護作新政權的掌握者，自然有很多都見機而作地「投降」了。也有些地方督撫堅持反對革命，棄官而走，也被擁戴出來組織「新」政府的人，也仍舊是滿清的軍人官僚和立憲黨人。革命黨人幾乎一般地都以爲只有依靠這些人，跟這些人妥協了，才能獲得政權的穩定。

最足以說明這種性質的獨立的是江蘇。上海革命黨起義的消息傳到蘇州以後，蘇州的紳商各界和立憲黨人立刻恐慌起來，紛紛推派代表晉謁巡撫程德全，要求他宣佈獨立，以避免革命。柳東一蟹所著「漢族光復史」對江蘇獨立有一段非常生動的紀述，節錄如下：

十四日上午上海某商董到蘇面謁中丞（事在各界代表請願以後），力勸早日獨立，免致全城塗炭。撫院首肯。晚即傳書各兵隊預備白布，明早應用。次日早七時，省中新兵防營一律肩荷快槍，臂纏白布，排隊詣撫署。自大堂至頭門分站兩旁，刀光臂布，輝映如雪，軍容整肅，氣象一新。大們上高懸『中華民國都督府興漢保民』白旗一面。門口懸有之『江蘇巡撫部院』額亦改書『都督府』。八時，各司道府縣仍衣冠上院。即至官廳小憩。時藩司左孝同有悻悻不豫之色，提學使樊恭煦則云：『大清大漢我都不管。我只辦我份內應辦之事便了。』九時，程都督著黃色寧綢馬褂，便衣出至大堂。向外立。上海司令部代表某向內立。當衆演說數語畢，手持紅綾包裹都督印一方授與都督，都督受印訖，亦致答詞。大致謂：『鄙人此舉，乃爲保全蘇省數百萬人民生命財產計，甚願諸君始終如一，克達完全之目的。蘇省幸甚，鄙人幸甚！』都督語畢，聽者拍手，各兵均擊槍示敬。……當夜佔領時，未放一槍。居民皆未知悉。次日各店舖照常交易，即小販亦仍上市。

安徽、廣西、廣東第一次推舉出任都督的也是原任巡撫。廣西第一任都督沈秉堃辭職以後，繼任的即爲清軍提督陸榮廷。山西的閻錫山，陝西的張鳳翽，貴州的楊蔭誠，福建的孫道仁都是以清軍協統被推爲都督的。

像武昌起義第二天強迫封建勢力成立妥協的事件，同樣也在湖南發生。湖南獨立不久，革命黨都督焦達峯陳作新即因開罪新軍被殺，第二次由新軍推戴出任都督的是立憲黨人諮議

局局長譚延闓。譚因反對革命，百般不就。終以新軍挾持，只好流着眼淚走進都督府去。

革命黨人在各地方廣泛地與封建勢力妥協，贏得了壓倒滿清政府的表面的聲勢，並爲這種聲勢所陶醉。本來在各省宣佈獨立的時候，都會或先或後的引起過民間的騷動，人民以爲「反正」的意義就是被壓迫者的翻身，紛紛活動起來，即使像江蘇這樣真正稱得上「兵不血刃」就告「光復」的地方也不安靜，但是革命黨人、立憲黨人和封建勢力的地方聯合政府成立以後，人民的翻身運動就被鎮壓下去了，

五 牛鬼蛇神一齊出現

到十一月中旬，雖然湘鄂聯軍守衛漢陽和蘇浙聯軍進攻南京的戰爭都正在猛烈進行着，但湘、陝、贛、晉、滇、滬、蘇、浙、黔、桂、皖、粵各省相繼獨立，革命勢力已經算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了。在各省地方政府建立的同時，革命黨人，立憲黨人和封建官僚之間就開始了一個大規模分化與結合的過程。到這時候，由於各地都看到有建立一個中央政權機構的必要，大家就更爭着想在這中央政權中抓一把。於是便以武昌與上海爲中心，一個連接一

個出現了各種光怪陸離的小黨派和小集團。這些小黨派小集團，往往是少數幾個人甚至一個人所發起，拉攏幾個見獵心喜的同志和可資號召的軍政紅人，就把招牌掛起，發表宣言，招收黨徒，到處活動。有的是爲了擁護一個領袖共謀富貴而組織的，有的是爲了保持並爭幾個人的地位而組織的，有的則是爲了對抗其他集團而組織的。各個小黨派小集團都紛紛拉攏人、連絡人；有許多被人爭相羅致或擁護的紅人，他們的名字甚至同時出現在好幾個黨派的文件上。這些黨派口口聲聲都是主張『共和』的，事實上却都沒有嚴格、固定的政治原則，都只惟利是圖，因而亦旋生旋滅，旋合旋分，流動不居。其中有許多到現在已經只留下一紙宣言和簡章，來龍去脈都已不易攷知。

就在這些黨派裏面，有兩個是在組織臨時中央政府的活動中起過作用的。這就是：武昌的『民社』和上海的『共和統一會』。

民社以湖北人爲中心。目的在保持武昌首義集團的地位，擁黎元洪爲首領。主要份子有黎元洪的親信張伯烈、孫發緒、饒漢祥和本屬同盟會的湖北人藍天蔚、劉成禺、王正廷、孫武，再加上立憲黨人湖南都督譚延闓等，此外列名爲發起人的尚有李登輝、朱瑞、吳敬恒等

人。本部設上海，在上海出版『民聲日報』，標榜『進步主義』。他們所圖謀的是維持武昌集團在中央政府中的地位，並且主張建國都於武昌。

共和統一會代表着當時彙集在上海的一個大集團。其發起人有上海都督陳其美和原屬同盟會的伍廷芳、王寵惠、馬君武、紐永建、于右任，以及立憲黨人張謇、唐文治、溫宗堯、景耀月，此外還有剛由滿清政府釋放、深感載灃不殺之恩^①、且已加入袁世凱集團、與楊度等合組『國事共濟會』的汪兆銘等。在『共和統一會意見書』中，他們提出的當前急務爲：

- 一、宜籌軍國步伐之統一；
- 二、宜謀南北之統一；
- 三、維持幕府意見之統一；
- 四、宜謀地方民政之統一；
- 五、宜謀國是及政體之統一；
- 六、宜謀領土之統一；
- 七、宜謀輿論之統一。

而『概以言之，即設一共和政治進行時代有力之樞機』，也就是建立一個中央政府。

還有一個自稱在武昌起義以後，海內黨派尙未發生，即已開始活動的『國民協會』，其主要份子爲謝遠涵、張國淦、梅光遠、張嘉璈等，都是立憲黨人；參加該會的南北要人有伍

① 見朱師晦所著『清肅王墓誌銘』序文。

廷芳、徐紹楨、湯壽潛、薩鎮冰、嚴復、徐世昌、葉恭綽、楊度、貢彞諾爾布、阿穆爾靈圭等，而以唐紹儀爲名譽總理。本部設於上海，在北京、天津、南京、杭州、南通、紹興、宜興、福州、安慶、全椒、興化、泰縣、南昌等設有支部。牠亦以革命黨自居，發表宣言，主張從速統一，建立議會政治。上海『民報』，福州『民心日報』，均爲該會機關報（該會於一九二二年七月發表過著名的『借外債救亡』的主張）。

此外在同一時期出現的還有『中華共和促進會』，『國民聯合會』，『共和建設會』，『民黨進行社』和江亢虎的『社會黨』。當時組黨組派準備參政的風氣普遍到每一個地方，各省無不黨派林立，宣言簡章滿天飛，甚至『中國佛教協進會』的成立宣言也發了一通『改造僧界，破除家族制度，實行共產主義，普及教育，振興實業』的議論。

這時候立憲黨人和封建餘孽一齊唱着新式『共和』調子，他們在早幾年組織的老團體也都在翻新之中，準備着迎接新時代。至於原來的革命黨——同盟會，除了接受一批改唱新調的立憲黨人和封建餘孽入黨以外，不但毫無作爲，而且牠的會員很多都紛紛離開革命參加爭權奪利，也就不得不與日俱進地贏得時人的笑罵了。

六 各省都督府代表會議

在這一班新老政客奔走下，武昌上海同時出現了組織中央政府的運動，形成兩個集團，互爭領導。到十一月九日，武昌方面便由黎元洪以首義地位發出通電，請宣佈獨立各省速派代表來鄂會商組織臨時中央政府，要求各國承認『庶國基，可以粗定』，並對臨時政府內部組織及人選提出了一些具體意見。

當時上海雖然獨立還不到一個禮拜，但早就有各省旅居上海的革命黨人與立憲黨人在交換意見，成立共和統一會，進行組織中央政府，準備先在上海建立一個各省聯合機構。因為對領銜動議的人選尚在斟酌，未能即將通電發出。到十一月十一日，才徵得蘇督程德全和浙督湯壽潛的同意，用程湯兩督名義致電滬督陳其美，主張由各省舊諮議局與都督府各派代表一人赴滬，在滬設立臨時會議機關，兩省以上代表到會即行開議。十一月十二日又以江蘇都督代表雷奮、沈恩孚，浙江都督府代表姚桐豫、高爾登名義向各省提出同樣的建議。十一月十五日在上海開第一次會議，定名為『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上海集團的組織遂正式

成立。這個集團雖然在組織上並不怎樣強固，意志也並不怎樣齊一，却隱然以領導組織中央政府自任，對後來南京政府內部鬥爭極有影響。

十一月十七日至廿日，上海的代表會討論黎元洪請派代表赴鄂開會的提議，決定答以：上海交通便利，會議地點以上海爲宜，並請黎速派代表出席；但仍承認武昌爲民國中央政府，由鄂軍都督執行中央政務；並請以中央軍政府名義委任各代表所推定的伍廷芳、溫宗堯爲臨時外交代表。武昌方面接到這個決議以後，非常不滿，認爲既承認武昌爲中央政府，則代表會自亦應在政府所在地開會。隨即派居正、陶鳳集赴滬力爭。代表會於十一月廿四日開會討論，終於決定尊重鄂方意見，各省代表各以一人留滬保持對外聯絡，組織臨時政府問題改在武昌繼續討論。當代表們陸續由上海來到武昌的時候，黃興所統率的湘鄂聯軍正在漢陽大吃敗仗，武昌已全城陷入清軍炮火威脅之下，只好改借漢口英租界順昌洋行開會。十一月卅日舉行第一次會議，推定譚人鳳爲議長。會議到第五天時，因漢陽失守以後軍事情勢十分緊急，而南京克復的捷報又傳來了，便在這天決議以南京爲臨時政府所在地，各代表一星期內在南京會齊，繼續開會；俟有十省以上代表出席，即開會選舉臨時大總統。

這些代表所代表的省分，包括湖北、山東、福建、湖南、安徽、廣西、浙江、江蘇、直隸、河南十省。當時直隸河南兩省在滿清統治之下，革命政府尙未成立。直隸代表谷鍾秀與河南代表黃可權係以滿清諮議局議員代表資格出席會議。其他各省代表則係各省都督指派，亦有因路途遙遠，由鄂軍政府代爲就近指派然後去電徵請同意的。其中半係會充滿清諮議局議員的立憲黨人。他們在漢口開會的五天中，通過了兩個重大議案。這兩個議案十分鮮明地表現了代表的本質和立場是什麼。決議中的一個是：『如袁世凱反正，當公舉爲大總統。』爲什麼要作這個決議？藉口是袁世凱已派人來講和。實際是因爲代表們所代表的都督已經在各地抓到了政權，而代表們自己則已經取得了建立中央政府的機會，無論在中央，在地方，都已經有了參加政權的地位，所以他們已不得革命趕快收場，好讓他們的地位穩定下來。爲了這個目的，就不惜以大總統位置爲拉攏袁世凱的手段，以拉攏袁世凱爲結束革命的手段。只要袁世凱『反正』，他們就擁護袁世凱做他們的新主子，來一個全國軍閥官僚皆大歡喜的大團圓。

決議中的另一個，就是通過『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廿一條，並由十省代表當場簽字，立

即公布。在這個大綱裏面，除了沒有規定取消「中華民國」而外，毫無民主意義。大綱所規定的中央政府是由各省都督府代表控制的；總統由各省都督府代表選舉；參議院由各省都督府各派參議員三人組成；參議院成立以前，由各省都督府代表會代其職權；而參議院則握有議決預算，檢查出納及立法之權與宣戰、媾和、任用部長的同意權等。完全以各省都督府爲構成國家政權的單位。

然而當時革命黨並不認爲這個臨時政府的組織和「建立民國」毫不相干。他們和別的不革命的黨派在政治意見上極少歧異，只要國家沒有皇帝，就稱之爲「民國」。

這裏只是歷史的開篇，好戲還在後頭。

七 建立臨時政府的鬥爭

當漢口的代表會正在開會的時候，因爲湘鄂聯軍失去漢陽而蘇浙聯軍打下南京，武昌集團與上海集團的地位也相應地一個削弱了，一個加強了。陳其美即於十二月四日會同程湯兩督邀集原來留在上海做聯絡工作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舉行會議，認爲漢陽失守，武昌危急，漢

口的代表已失去組織臨時政府的條件，而組織臨時政府又爲刻不容緩的工作，因即當場議決以南京爲臨時政府所在地，並選舉黃興爲大元帥，黎元洪爲副元帥。十二月五日又議決由大元帥主持組織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鄂方代表得到這個消息，大吃一驚。立即請黎元洪出面致電各省都督說：

各省代表均到鄂。議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並定期在南京公舉臨時大總統，組織臨時政府。經敵處通電各省，諒已達覽。現忽據來電稱：滬上有十四省代表推舉黃興爲大元帥，元洪爲副元帥之說。情節甚爲支離。如實有其事，請設法聲明取消，以免淆亂耳目。

十二月十日以後滬漢兩地代表陸續到達南京，鄂方代表的決議被承認下來，並定期十二月十六日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但前一天浙江代表陳毅從武昌來，報告一個驚人消息，說袁世凱議和代表唐紹儀到鄂時，表示袁內閣亦贊成共和。於是又決議緩舉臨時大總統，虛位以待袁世凱「反正」，先行承認滬方代表所推大元帥副元帥，並於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加上一條：「臨時大總統未舉定以前，其職權由大元帥暫任之。」這個妥協剛剛成立，一班蘇浙軍人因爲有打下南京之功，氣餒逼人，聲言不受漢陽敗將指揮，反對黃興任大元帥而屬意黎元

洪。其時適黃興亦來電辭職，遂於十二月十七日改推黎元洪爲大元帥，黃興爲副元帥。黎駐武昌，大元帥職務由副元帥代行。黎接受這個辦法，但黃仍不肯接受。拖到十二月下旬，臨時政府還是組織不起來。

到十二月廿五日孫中山由美返國。這個新事件使代表們靈機一動，攔起大元帥副元帥問題不談，決定選舉孫中山爲臨時大總統。一方面藉以解決組織臨時政府的一大難題，一方面藉以推崇一下這位勞苦功高的革命領袖。但爲了不開罪袁世凱，又決定請孫中山在當選後致電袁世凱，表示和議成功，即當避席（見十二月廿五日南京代表團致黎元洪電）。十二月廿九日開選舉臨時大總統會，到十七省代表，孫中山以十六票當選，只有浙江代表沒有投他的票。

臨時政府首腦問題解決以後，發現原來公布的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規定設大總統而無副總統，『行政各部』僅設外交、內務、財政、軍務、交通五部，『位置有限，不敷分配』。這個十分現實的需要引起了對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的修正。最初，當原案公布時，曾經有人認爲遺漏了關於人權的規定，實爲一大缺點。但這時候的爭執和這個大缺點毫無關係。沒有一個

人起來爭人權保障，也沒有一個人不贊成增設官位。非常順利的，代表們同意了修正案的兩個主要點：一、增設副總統；二、把原案規定的行政部五部改爲『國務各員』，不作硬性的規定。

但這時，還有另一個修正案却引起了激烈的爭執。那就是宋教仁主張最力的一個提議：將原案總統制改爲國務員負責的內閣制。宋教仁是同盟會領袖之一。當時有人傳說宋教仁想作內閣總理，他力主責任內閣制，純係爲自己打算。這個傳說引起了上海集團的蘇、浙、皖各省代表們對宋教仁的攻擊。也不管責任內閣制要得要不得，爲了反對宋教仁，就反對責任內閣制。爭執延長了五天，宋教仁舌敝唇焦，責任內閣制終於被否決了。甚至在孫中山任命國務員的時候，提出以宋教仁爲內務總長也被否決了。

孫中山於民國元年一月一日（一九一二年）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一月二日，代表會通過組織大綱修正案。一月三日選舉黎元洪爲副總統。同日孫中山宣布國務員名單，行政各部由五部增爲九部。一個包括封建勢力、立憲黨人和革命黨人的中央的臨時聯合政府至此遂告成立。

八 帝國主義支持誰？

從武昌起義開始，在革命的全過程中，革命黨的妥協政策和帝國主義的活動，顯著地影響着事件的進展。帝國主義的對華政策本來以確保既得利益爲中心。要確保既得利益，就要維持半殖民地的中國現狀。革命是要求破壞並改變現狀的。假如革命成功，中國民族資本主義隨之長足發展，中國民族的獨立運動也會高漲起來，那就違反帝國主義的利益了。因此帝國主義一貫的反對中國革命，並且幫助滿清政府鎮壓革命。

太平天國興起的時候，曾發表過和協外邦的宣言，表示：「彼此通商，理所應然。將來事定，只有洋烟（鴉片）再勿來吾中國。其餘自由貿易，無所禁止。」其時帝國主義入侵未久，滿清政府對外還很頑強。帝國主義看到太平天國足以削弱這個傲慢的王朝，所以在太平天國初期，列強一致採取中立態度。到天津條約締結以後，各國有了更多的利益與特權須要維持，而太平天國聲威日盛一日，滿清統治被削弱到瀕於崩潰，各國即放棄中立，爲維持本身利益而維持滿清政府，公然協助討伐太平天國了。

甲午戰爭（一八九五年）以後，隨着帝國主義在華勢力範圍競爭的加緊，中國革命運動大舉抬頭。到一八九八年，遂有美國務卿海約翰致英、德、俄、法、意、日各國門戶開放通牒，要求『鞏固並保全該帝國』。庚子八國聯軍之役（一九〇〇年）本起於中國人民的反帝運動，自聯軍陷北京以後，革命危機隨着各國瓜分中國的危機嚴重起來。海約翰復於是年七月三日向俄、匈、比、法、德、英、意、葡八國致送第二次門戶開放通牒，更明確地聲明：『渴望一種解決，能使中國永遠安寧與和平，保存中國領土的和行政的完整，擁護一切以條約與國際法所保證之友好國家的權利。』美帝國主義因為在中國沒有勢力範圍，所以主張門戶開放，但門戶開放仍承認各國既定勢力範圍。用這樞妥協辦法，各國重又把個岌岌可危的滿清王朝維繫了下來。一面仍舊壓迫他，一面却又保全他，扶植他，不讓他垮下去。

武昌起義以後，軍政府成立的第二天，就把七年前同盟會在東京擬好的對外宣言分送漢口各國領事館。表示革命政府也如滿清政府一樣，願意承認各國既得利益和特權。各國領事觀察了一個星期，北京外交團的決策已定，終於在廿七日貼出宣布中立的布告。本來在武昌起義以前，湖廣總督瑞澂鑒於情勢嚴重，早與德國領事商量好，請其調兵艦到武漢。準備一

且革命黨起事，即開砲轟擊。起義第二天，瑞澂由楚豫兵艦跑到漢口德領事館，請求如約予以協助。德領事不敢單獨行動，乃提請領事團會議公決。領事團開會情形，孫中山在他所著『心理建設』一書中有如次的敘述：

初意欲得多數表決，即行開砲攻擊以平之。各國領事對此皆無成見。惟法國領事羅氏，乃予奮交。深悉革命內容。時武昌起事之第一日則揭吾名，稱予命令而發難者。法領事於會議席上乃力言孫逸仙派之革命黨乃以改良政治爲目的，決非無意識之舉，不能以義和拳匪一例而加干涉也。時領袖領事爲俄國。俄領事與法領事取同一之態度。於是各國多贊成之。乃決定不加干涉，而並出宣布中立之布告。

各國宣布中立以後革命黨方面即認爲滿清政府從此已陷孤立。實際上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帝國主義各國這時正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尖銳矛盾之中，他們要在歐州打仗，就不可能在中國實施有力的武裝干涉。同時他們顯然認爲革命黨並不可怕，當時英國駐北京公使朱爾典給英國政府的報告說：『叛軍將領黎元洪，據報告是一個很有知識的人，能說英語，會有一些在外國的經驗。他已通告漢口各國領事說，他所建立的政府，必將尊重對於列強的現有條約與現狀，並將充分保護一切外國人，只要他們不幫助滿清政府。』可是他說：

「現在一般意見是目前叛亂將被壓制下去，但滿清王朝的前途却是很慘淡的，它已普遍地爲人民所不信任。」

根據這個認識，帝國主義採取着觀望投機的「中立」態度，暗中在北京加緊布置袁世凱的再起，向滿清政府提出非袁不能收拾的意見，準備捧出袁世凱來強化滿清政府的地位。在他的報告中，朱爾典對袁世凱的期望是很高的，他說：「他的名字對軍隊可以起很大作用，……他的忠誠是沒有問題的。」

在這個「中立」態度下，帝國主義用一切方法斷絕民軍的經濟來源並乘機取利。南方各口岸的洋稅務司首先以維持各國債權爲口實，逕行控制了全部海關收入，而北方各口岸的稅收，據總稅務司安格聯（E. A. Aglen）在一個備忘錄中說：『滿清政府還能控制的北方許多口岸，由洋稅務司所徵集的稅收，仍有相當數量繼續流入滿清政府的國庫。』到十二月中，南北和談開始之際，帝國主義又把北方口岸的稅收控制了。

南京政府方面失去革命原則的友好態度，確乎是帝國主義不會料想到的。但帝國主義並沒有加以賞識，仍舊稱他們爲「過激黨」（Radical），用一副懷着惡意的冷靜的眼睛注視

他們。南京政府成立以後的經濟情況是十分困窘的。一九二二年一月八日即由參議院議決發行公債一萬萬元，實收僅五百萬元。當時各省稅收只能供各省支出，而軍費政費全由中央負擔，終於不能不向外國請求借款。第一次以招商局和漢冶萍公司作抵，第二次以全國賦稅作抵，經過許多談判，甚至已經簽字的合約也被宣告作廢。帝國主義宣稱對南北兩方都不借款，而袁世凱說北京市面不能維持，奧國就出面借給他七十萬鎊。南京政府是萬分想望獲得各國承認的，一九二二年一月間，曾數次由外長王寵惠致電美國請求承認，美國政府毫無表示。而袁世凱以滿清內閣改稱的臨時政府，一紙通告發出，各國公使即爲『默示之承認』，與之發生事實上的外交關係。

這就是當時革命黨人曾經爲之欣喜不盡的帝國主義的『中立』。

第三章 袁世凱的竊國陰謀

武昌的槍聲一響，就在北方給袁世凱帶來了機會。他的黨羽和外國人一致捧他，滿清政府被迫着不能不起用他以挽救垂危的命運。可是，正如陳伯達先生所說：「袁世凱的箭，一方面要射倒滿清朝廷，一方面要射倒革命。」他用射倒滿清的箭是革命，拿各種藉口和要求拖延時間，使革命擴大，迫使滿清政府不得不向他屈服。但當滿清要倒的時候，他又趕忙把它扶起，用作射倒革命的箭。他要求民軍同意君主立憲，對民軍打一下拉一把，打的時候以拉爲目的，拉的時候以打爲威脅，幾個回合之下，終於迫使民軍接受他的和談建議。

在和談中，南京政府爲了堅持反對君主立憲，甚至不惜以交出政權向袁世凱換取清帝退位。和談成功而南京政府與滿清政府同時並倒，南北統一於袁世凱。

南京的政要們在決定了把政權交給袁世凱以後，仍舊一點沒有失望，因爲他們認爲把國都建在南京，使袁世凱到南方來做總統，再用約法規定的責任內閣制把他約束起來，則他們

所嚮往的民國政治局面就出現了。

但是事實很快就證明出來，這一切的努力全是徒然的。

一 滿清統治的崩潰與袁世凱的起用

武昌起義之日，滿清政府剛頒下一道上諭，嘉獎瑞澂弭亂之功，次日即收到瑞澂電報，奏稱武昌已被「革匪」佔領，真是驚駭萬狀。十月十二日倉卒諭令瑞澂張彪革職留任，戴罪圖功；並派陸軍大臣蔭昌親率北洋軍兩鎮（即兩師）南下，「討伐叛亂」。清廷並未料及這突發事變，事前全國新建陸軍均已奉命開赴永平（今盧龍，在北平西北）參加秋操，有三萬餘人已集中永平，其餘亦在途中。這時又不敢調開京城附近軍隊，只得臨時下諭停止秋操，就集中永平及駐紮保定的軍隊湊派兩鎮為南下軍。但京漢路運輸力有限，輸送軍隊一鎮，至少需時一星期，秋操軍隊又無子彈，集中以後，尚須等待子彈運到方能作戰。手忙腳亂，自不消說。奉到動員令的軍隊，反應也毫不熱烈，以至官方人士對陸軍忠心與否，極表疑慮；認為蔭昌要在這樣緊急情況下，帶這樣一支軍隊去打仗，顯然是十分困難的。

北京外人方面早就對滿清政府的腐敗無能表示不滿，認為必須任用一個有才能有實力的人，才能穩定這個帝國。他們以外國觀察家的地位品評中國當代人才，特別推重袁世凱。他們希望袁世凱出來担任這個任務，認為他是中國現代陸軍的創造者，只有他具有才能和威望來統率一個大部隊，使軍人效忠政府。這種見解正合着同情袁世凱的官方人士的希望。在武昌起義以前幾個星期，事實上北京官方已有過起用袁世凱的擬議，並且非正式地會與袁世凱接洽過，那桐和奕劻甚至曾經把這個擬議奏聞攝政王載灃。他們認為目前正須集中人才，袁世凱雖未必如外國觀察家所說那樣衆望所歸，倒也不失爲協調各方意見的人物。但因爲載灃還不以爲然，終於擱置。

武昌起義以後，外國觀察家更衆口一詞，說如再不起用袁世凱，局面將無法收拾。這時載灃已經沒了主意，見外人如此推重袁世凱，只好一面趕緊派人向袁接頭，一面於十月十四日下諭起用袁世凱爲湖廣總督，兼辦剿匪事宜。這個命令頒布以後，外國觀察家還惋惜這一個着做得太遲，他們以爲袁世凱本因載灃的排漢政策而被逐，現在反滿革命起來了，很可能他要投向革命黨方面一洩鬱積已久的憤恨，雖然他們認爲革命黨對袁也並無好感。

這時袁世凱正在彰德。自從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光緒卅四年）因載灃說他有『足疾』，被削除兵權以後，袁就在彰德『養病』。由於北洋軍一班幹部都傾向他，外國人又重視他，身雖在野却仍隱然爲一實力派領袖。在滿清政府裏面，總理大臣奕劻素來器重他，協理大臣徐世昌是他的老友；在北京，兒子袁克定是他的代表；在天津，趙秉鈞是他的耳目；奔走北京彰德間的楊度楊士琦是他們的聯絡員。南北大事沒一件瞞得過他。滿清政府發表他爲湖廣總督的任命使他認識滿清王朝削弱到必須求助於他了。但是如果事態不繼續擴大，滿清王朝不繼續削弱，就不會死心塌地倚靠他。他需要時間來選擇他的機會。對於給他的新任命，他回說足疾未痊，去冬以來，又牽及左臂，須醫好以後才能應命。

袁世凱的態度急煞了滿朝親貴。皇帝的威權隨着袁世凱的推延和革命的高漲在一天一天下降。十月廿日奕劻只好命徐世昌赴彰德，親訪袁世凱勸駕。當徐世昌回到北京的時候，帶回了袁世凱提出的六個條件。並且說，如不承認，決不出山。這六個條件是：一、明年即開國會；二、組織責任內閣；三、寬容參與此次事件諸人；四、解除黨禁；五、須委以指揮水陸各軍及關於軍隊編制之全權；六、須與以十分充足之軍費。

這六個條件的提出，明朗地表現出袁世凱的態度：對滿清政府，他要求全部權力以建立他的軍事獨裁；對革命黨，他準備妥協。這時袁世凱顯然已經看準了兩個事實：一邊是滿清王朝搖搖欲墜，一邊是革命黨所表現的軟弱性與妥協性。掌握了朝廷的大權，革命黨便不難在妥協中就範。滿清政府當然不願意接受袁世凱的條件，交出大權。但袁世凱堅持不接受條件，就出山。相持到十月廿二日以後，湖南、陝西、江西等地相繼獨立，革命黨的聲勢日益浩大。蔭昌在信陽孝感之間奔來跑去，指揮不靈，急得皇皇無主，日盼袁世凱出山，好把責任卸掉。滿清政府無計可施，乃於十月廿七日下午令召回蔭昌，另派袁世凱為欽差大臣，節制水陸各軍，以馮國璋為第一軍軍統，段祺瑞為第二軍軍統。馮段二人都是袁世凱的老部下。

然而袁世凱認為滿清政府還沒有全部接受他的條件，他仍滯留彰德，不肯即出。

這時北京資政院正在開會，立憲黨人認為立憲的時機已至，首先發動攻擊郵傳大臣盛宣懷，指摘他引起四川鐵道風潮，造成武昌事變；接着就在清廷任命袁世凱為欽差大臣的同一天，提出一個上奏案，主張取消親貴內閣，赦免國事犯，即開國會。正當滿清政府忙着討論應付這個奏章的時候，十月二十九日駐漢州的陸軍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協統藍天蔚等又打

來一個電報，提出主張十二項，要求本年內召集國會，制訂憲法，組織責任內閣，削除皇族特權，特赦國事犯，態度強硬，形勢尤其嚴重。張藍等事先與第六鎮統制吳祿貞等計劃好，如條件提出後，滿廷拒絕接受，即行率兵進攻北京。恰好山西亦於同日宣佈獨立，使北京受到東西兩面夾攻的威脅。載灃知道現在已經只有讓步才能緩和這個緊張的局勢。於是在十月卅日下罪己詔，宣佈解除黨禁，承認革命黨爲合法政黨，並釋放在一九一〇年謀炸載灃的汪精衛黃復生，命資政院立即起草憲法，宣佈十一月一日起解散皇族內閣，十一月二日又任命袁世凱爲內閣總理大臣，三日資政院奏呈憲法十九條，立即公佈。同時即又任命錫良爲熱河都統，準備遷都熱河。

北京危機的顯露和滿清統治的迅速崩潰，使袁世凱改變了他的態度。十一月一日即由彰德到孝感視師，一面竭力穩定滿清政府，諫阻遷都，辭謝組閣任；一面暗中布置解決北方局勢，買通變節份子於十一月七日刺殺當時密謀聯合張藍與山西軍隊進攻北京的吳祿貞於石家莊，破壞了北方軍人異動的全部計劃。北京資政院於十一月八日正式選舉袁世凱爲內閣總理，袁仍辭職不就，清廷再三致電催促，乃於十一月十三日北上。十六日宣布組閣，並發表

政見說：

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爲君主立憲政體。……尤有重大之問題則在保存中國，此不能不仰仗各黨愛國者犧牲其政策，共助我之目的。以至中國之分裂及以後種種之惡果。……余願進步黨人思邦國應至若何地步，與余通力合作，使各要事皆處置妥當也。

二 袁世凱對革命黨的一打一拉

十一月廿七日，革命軍在漢口吃了一次敗仗。同時傳來了滿清政府任命袁世凱爲欽差大臣，蔭昌解職回京的消息。武昌軍政府一班首腦人物議論紛紛。據說黎元洪當時曾說：『袁世凱是個野心梟雄，自小站練兵即得兵心。北方人只知道袁宮保不知其他，他的魔力非蔭昌可比。』說話之間，且已露恐懼之色。革命黨人則說：『袁世凱出山，也沒甚關係，他既是漢人，如有一綫天良，決不爲滿人出力。他若能奪得蔭昌兵柄，與民軍一致，我們也可以利用他的。』當下就用『湖北全省士民』名義，寫了一封信給袁世凱，勸他『率部下健兒，回旗北向，鞏掃虜廷。』並且說『漢族之華密頓，惟閣下之是望。』這時袁世凱還在彰德，讀到這封信，覺得正中下懷，就叫他的幕僚劉承恩（與黎元洪係同鄉）於十月廿九日寫了一封

信給黎元洪，轉達袁世凱一片悲天憫人之意，主張早日和平了結，以免生靈塗炭，清廷既已實行立憲，『且看政府行爲如何，可則竭力整頓，否則再行設策以謀之。』而對起義諸人『不獨不咎既往，尚可定必重用，相助辦理朝政。』當十一月一日袁世凱到達孝感以後，又叫劉承恩寫信給黎元洪提示和平辦法。武昌方面仍無答覆，然而對袁深懷恐懼。十一月二日漢口失守，袁世凱第三次命劉承恩寫信給黎元洪表示願和平了結，不欲再戰。於是武昌方面利用袁世凱反戈之說再起，回信說，只要袁世凱不抗漢人革命，即推戴袁世凱爲大總統。

和平試探至此，袁世凱認爲已具端倪，而清軍進攻漢陽的準備亦已完成，即於十一月十日特派蔡廷幹劉承恩爲代表，請漢口英國領事出面介紹，帶了袁世凱的信件，到武昌向黎元洪提出和議，說如果革命黨能承認君主立憲，可立即停戰，否則將繼續用武力謀求解決。當時黎元洪即與宋教仁、湯化龍、胡瑛等召集武昌各機關人員在都督府開了一次大會，跟兩位和平使者舉行公開談判。在會議中，革命黨人分成了兩派，孫武胡瑛等兩人主張不妨一談，其餘大多數人以吳兆麟、張振武爲首，都採取了堅決拒絕和議的態度。但大底都還是認爲以袁世凱所處地位『如順從民意，則達目的易如反掌』，因而轉請蔡廷幹、劉承恩勸袁倒戈北

伐。

事後袁世凱又進行了一回分化民軍的陰謀。派袁克定秘密赴漢陽，訪新任民軍總司令黃興，示意共同行動。黃興由滬到鄂不久，人望至高，氣勢正盛，當然不肯接受袁的勾引。這時袁忙着要北上組閣，決定先把民軍打一下再提和議，在他離孝感前即下令猛攻漢陽。

十一月廿七日清軍佔領漢陽，並開始在龜山用大炮瞄準武昌轟擊。武昌人心惶惶，謠言四起。在軍政府的首腦裏面，開始表現出無比的動搖。黃興從漢陽敗退回來，說他在前方目擊敵人機關槍利害，軍隊四散逃亡。他認為軍隊無訓練，缺乏機關槍，無法繼續作戰，不如放棄武昌，轉攻南京，待佔領了南京再訓練了一支精銳軍隊來作收復之計。黃興的主張爲一班在武昌首先起義的幹部所堅反對。他決們要求與武昌共存亡，死守待援。張振武甚至大叫說『誰敢再主張退出武昌，就殺誰！』黃興見勢不妙，就在這天下午搭船到上海去了。十二月一日武昌都督府中砲起火，黎元洪嚇得毫無主意，帶了衛兵兩隊，隨從三四人，坐了一乘轎子，亦不通知任何人，就逃到了距離武昌九十里的葛店。待參謀總長吳兆麟和護理總司令蔣翊武得到消息時，武昌城內的居民和軍隊已經因黎都督的出走，開始四散逃竄了。

可是清軍佔領了漢陽以後，只管對武昌開砲，却並不渡江繼續進攻。因為袁世凱認定這是個提出和議的大好機會。經過袁世凱和英使朱爾典的商議，即由朱爾典電令駐漢英領向雙方提議停戰，十二月一日，當武昌局面正在瓦解這一天的黃昏時候，英領事職員盤恩從漢口來到武昌求見黎元洪。由顧問孫發緒領着運到洪山總司令部，吳兆麟接見了他。非常禮貌的，他對吳兆麟說：『我們英國領事見武昌城里天天在大砲轟擊之下，城內百姓受禍最慘。故此聯合各國領事與清軍商議，暫且停戰三日，現在清軍已表贊同，特派我來面謁黎都督，請都督認可，將我帶來的公文蓋印，然後再送清軍蓋印，即可停戰。』眼看就要陷入絕境的革命黨人聽了這一番話，真是如逢大赦。當時都督印信已被黎元洪帶走，沒有兩天時間取不回來。就一面由吳兆麟把盤恩敷衍着，一面僱了個刻字匠臨時照樣趕刻都督大印一方，把停戰公文蓋了印，交盤恩帶回漢口，暫時建立了武漢區的局部停戰。三日期滿以後，又由英領通知雙方繼續停戰三日，但當第二次停戰三日開始的時候，袁世凱由北京直接拍來一電，主張第二次停戰三日期滿繼續停戰十五日，由唐紹儀充清內閣總理大臣代表與黎元洪或其代表人討論大局。當時各省都督府代表正在漢口開會，他們接受了袁世凱的和談建議，正如本書

前文所述，通過了『如袁世凱反正，當舉爲臨時大總統』的議案，民軍和談代表爲伍廷芳，議和地點爲漢口。

三 和談

袁世凱和談代表唐紹儀於十二月九日到漢口。但這時上海集團爲了掌握中央政府的領導權，堅決反對以漢口爲談判地點，並通知袁世凱說，武昌方面無權進行談判，與武昌方面成立的任何協定都不能得到黨人的承認。從袁世凱看來，他是極端不願意改變談判地點的，他希望以黎元洪爲談判對象，他知道黎元洪不是革命黨，而是一個保守的、更富於妥協思想的人物。但由於武昌方面對此並不堅持，袁世凱終於同意改以上海爲談判地點。唐紹儀亦於十二月十七日到達上海。

談判前的各地空氣是十分緊張的。在袁世凱方面，談判是屬於他在進攻漢陽以前布置好的步驟，談判不好，仍舊要繼續打。事實上，前方也仍舊是劍拔弩張隨時發生衝突的。在民軍方面漢陽雖失守，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優勢仍舊存在，他們願意與袁世凱妥協，但清帝必須

退位的要求是決不放棄的。經過談判地點的爭執，這個要求表現得更爲強烈。形勢如是之緊張，使帝國主義國家特別關心。直到此時，帝國主義仍舊是希望保留一個由袁世凱專政的大清帝國，退而求其次，則爲由袁世凱專政的中華民國。十二月十五日北京外交團舉行會議，決定由各國公使向本國政府電商先採取步驟，對和談雙方施以壓力，促成妥協。

十二月十八日，唐紹儀與民軍代表伍廷芳舉行第一次會議，成立了湖北、陝西、山東、安徽、江蘇和奉天的停戰協定。十二月廿日上午即有英、法、德、日、俄、美六國代表拜會談判雙方首席代表，提出北京外交團的意見書一件，原文如下：

大不列顛代表團受英國政府之命，由後列非正式代表向協商恢復中國內部和平條件之貴會作如次之通告：英國政府認爲中國目前鬥爭之繼續存在，不惟足使中國本身抑且足使外人生命財產遭受嚴重危險。英國政府向持絕對中立態度，認爲有義務非正式喚起雙方代表注意儘速成立和解，停止現行衝突之必要。英國政府深信其見解實與有關雙方之願望相合。

但當時南方反滿情緒高漲，任何方面無法抑制。二十日下午舉行第二次會議時，伍廷芳即聲明，談判必須以承認共和爲前提，同時却有一項默契，就是只要袁世凱協同消滅滿清皇位，即以大總統位置作爲給袁世凱的酬報。在唐紹儀方面看來，他的主要使命是運用妥協手

夥，使孫才確切承認袁世凱的地位，君主民主都只是形式上問題。但他既不可能亦不必要強迫南方承認君主立憲，亦無權立即承認共和。於是他就提出一個暫時不作決定的折衷辦法，那就是『召開國會，舉君主民主問題付之公決。』清廷御前會議經過一度爭論，批准了這個辦法。十二月廿九日舉行的會議就開始了關於召開國民會議的討論，次日即簽定召開國民大會辦法四項。

但正在這時，十二月廿九日南京代表會選舉了孫中山爲臨時大總統，報告和談協議的電報和孫中山『暫時承乏，虛位以待』的電報先後到達北京。孫中山並定於一月一日就職，宣告成立臨時政府。袁世凱大失所望，覺得民軍方面的諾言靠不住。立刻致電唐紹儀，斥責他行動越權，不予承認。唐即於一月一日電請辭職，並且宣佈他本人同情共和，正式加入同盟會。袁覆電照准，並致電伍廷芳否認唐紹儀在滬簽定各款，以後由袁自任交涉。聲言：『南北協約，以君主立憲爲前提，而唐伍兩全權擅用共和政體，逾其職權。且協約未決，南人先組政府，公選大總統，有悖協約本旨。』同時進行以武力威脅南京政府，密令北洋軍將校段祺瑞，姜桂題，倪嗣冲等四十二人，於孫中山就任臨時總統之日聯名通電主張維持君主立

憲，聲稱：『若以少數意見採用共和政體，必誓死抵抗。』和談至此，彷彿就要決裂了。

但是決裂形勢是袁世凱造成的。袁世凱造成這個形勢，其意不過藉以加強談判地位，並判明南京是否確有以大總統相讓的妥協誠意。事實上，當時南京政府一切以各省都督府代表會的意志爲依歸，而不決定於真正的民意。各省都督府代表會是斷不會輕言決裂，放棄與袁世凱妥協的。同時南京政府向各國借款的要求既被拒絕，軍費浩大，財政極端困難，也十分害怕繼續戰爭。因此，自從唐紹儀辭職，袁世凱自任交涉以後，和談在形式上雖已停頓，幕後的秘密協商却反而隨着外表形勢之緊張而加強了。

幕後活動在唐紹儀與伍廷芳之間，楊度與汪精衛之間進行着；並且很乾脆的是只談清帝退位的交換條件，一切在會議席上要談的問題通通擱開了。這個談判到一月初以後，就已達到成議，即清帝在優待條件下退位，退位以後，孫中山辭去臨時總統，由袁世凱繼任。

四 逼宮與讓位

袁世凱通過秘密交涉確知南京真相以後，即進行壓迫清帝退位。並且陰謀利用清帝退位

時，不經國會決議，逕行宣布共和，取得自行組織臨時政府的藉口。他把退位優待條件交給奕劻，說大勢已去，革命黨既不肯讓步，用兵亦無把握，現在只有清室退位一途了。

退位條件提出以後，一班皇族王公極端反對。但一月十七日十八日連續舉行御前會議，都沒有結果。到一月十九日舉行第三次御前會議，袁世凱即命親信閣員趙秉鈞、梁士詒、胡惟德爲列席代表，由趙秉鈞提出內閣所擬解決時局方案，主張將北京滿清政府與南京臨時政府同時解散，另在天津設一臨時統一政府。這個方案把袁世凱的陰謀完全暴露。雖然有南京臨時政府陪着滿清政府同歸消滅，也不能使滿洲貴族感覺公平一點。不但原持反對態度的人激昂起來，連素來聽受袁世凱擺弄的奕劻也變了腔調，說另設統一政府則可，廢棄君位則不可。任憑三位列席代表說財政困難也好，外國干涉也好，內閣總辭職也好，貴族們都聽不進去。這時醞釀已久的滿洲貴族所組織的宗社黨即隨着大肆活動，良弼、毓朗、載澤、鐵良等一班人尤其憤慨萬狀，準備着作一次最後的決鬥，北京情況陷入異常混亂之中。

南京方面接獲袁世凱方案以後，也完全窺破了袁世凱的陰謀。但是他們沒有任何決裂的準備，只好仍在交涉上做工夫。立刻由伍廷芳致電責問袁世凱，並提出四項條件：一、清帝

退位，放棄一切主權；二、清帝不得干與臨時政府組織之事；三、臨時政府地點須在南京；四、孫總統須俟列國承認臨時政府，國內改革成就，和平確立，方行辭職；袁世凱在孫總統辭職以前，不得干與臨時政府一切之事。

一月廿二日孫中山又發表如次之聲明：

文前此所云于清帝退位時，即辭臨時大總統之職者，以袁世凱斷絕滿清政府一切關係，而爲中華民國之國民，斯時乃可舉袁爲總統也。然其後得由上海來電，袁之意非徒欲去滿清政府，且欲取消民國政府，于北方另組政府。彼所謂臨時政府，果爲君主抑爲民主，誰則知之？若彼自謂民主，誰則保證？故文須各國承認民國之後，始行解職。蓋欲使民國之基礎鞏固，決非前後矛盾。袁若能與滿清政府斷絕關係，爲民國之國民，文當履行前言。今確定辦法如下：

- 一、清帝退位，由袁同時知照駐京公使，請轉知民國政府，或轉飭駐滬各國領事轉達亦可；
 - 二、同時袁須宣布政見，絕對贊成共和主義；
 - 三、文接到外交團或領事團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後，即行辭職；
 - 四、由參議院舉袁爲臨時總統；
 - 五、袁被舉爲臨時總統後，誓守參議院所定之憲法，始能接受專權。
- 前之一二兩條即欲袁斷絕滿清政府之關係，變爲民國之國民，此爲最後解決之辦法。袁若不能實行，即不願贊同共和，無和平解決之誠意；如此則優待皇室及滿蒙各族條件亦不能施行；此後戰事再起，陷天下於流血之慘，亦將責有攸歸。

這個聲明措辭彷彿很強硬，中心所在仍不過是要袁世凱尊重組織政府的程序，而對於讓出臨時總統一點則作了公開而明確的表示。與其說這個聲明揭露了袁世凱的野心，倒不如說給袁世凱吃了一顆定心丸。

當時袁世凱已經處於圖窮匕見，一不做二不休的地步。吃下孫中山這顆定心丸知道南方一定讓位以後，即一心一意布置『逼宮』，壓迫清帝退位。一月二十七日，霹靂一聲，剛剛在三個星期以前通電『誓死反對共和』的北洋將領段祺瑞等四十餘人又發出長電一通，要求『立採共和政體』。恰好在前一天北京的革命黨人一炸彈把宗社黨首領良弼炸死，滿朝親貴正因為革命黨人深入北京嚇得心驚胆裂，讀到北洋將領的通電，知道大事已去，趕忙磋商退位條件，只求保全性命。

當二月三日南京政府接到袁世凱『今始有權以議優待之事』的電報以後，僅有少數人反對優待條件，黎元洪、伍廷芳及各省都督全主張『不妨從寬』。二月五日參議院通過優待條件及張春起草的清帝退位詔書，並將原稿電達袁世凱。二月十二日隆裕太后公布由袁內閣全體閣員附署的詔書，宣布退位。但在公布的詔書中，由袁世凱左右增加了如次幾句話：

袁世凱前經資政院選舉爲總理大臣，……當茲新舊代謝之際，須有南北統一之方，卽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

袁世凱卽於同日以『臨時政府首領』名義（各部大臣稱『各部首領』）將退位詔書致送各國公使轉致各國政府，宣告了袁世凱臨時政府的成立。同時又致電南京政府發表政見說：『共和爲最良之國體……永不使君政體再見於中國。』

清帝宣布退位和袁世凱贊成共和的消息實在使南方各地的各色人物熱昏了。就在第二天，孫中山首先放棄須待各國承認民國及袁世凱『變爲民國之國民』再行辭職的條件，認爲『帝制從此永不存留於中國之內，民國目的亦已達到』，『統一』高於一切，立即向參議院請辭臨時大總統。並以諮文二件致送參議院，說『此次清帝遜位，南北統一，袁君之力實多，』請舉袁世凱繼任總統。按當時全國軍政界上層人物擁袁如此熱烈，孫中山之辭職也幾乎是不得不然的。

二月十五日參議院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到十七省議員，每省一票，全體一致選舉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較之孫中山當選時更多得一票。參議院於是日致電袁世凱說：

本日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滿場一致，選公爲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查世界歷史，選舉大總統滿場一致者只華盛頓一人。同人深幸公爲世界之第二華盛頓，我中華民國之第一華盛頓。統一之偉業，共和之幸福，實基此日。務請得電後即日駕蒞南京參議院受職。共和萬歲！中華民國萬歲！

在同一時候，大元帥黎元洪傳令前線各軍準備復員，所有兵站一律撤消，並將湖北起義以來擴充的軍隊縮編爲四鎮，劃全省爲八管區，分別維持各區治安。孫中山致黎元洪電亦謂「自茲以往，無復戰爭之事矣！」尤其錦上添花的是美國參衆兩院亦於二月二十九日通過一個決議，致電袁世凱祝賀中國共和政府的成立。

五 爭都

當南京方面和袁世凱談判政權交易的時候，雖然全心全力爭取和袁世凱妥協，同時却又害怕袁世凱的。他們想制定一部約法來制裁他，並且堅持建都南京，以爲調虎離山之計。孫中山在向參議院請辭臨時總統的諮文後面，即附有包含這個目的條件三項：

- 一、臨時政府地點設於南京，爲各省代表所議定，不能更改；
- 二、辭職後，俟參議院舉定新總統，親到南京受任之時，大總統及國務各員始行辭職；

三、臨時政府約法爲參議院所制定，新總統必須遵守；頒布之一切法律規程，非經參議院改訂，仍繼續有效。

在他們選舉袁世凱爲臨時總統以後，就加緊了製定約法的工作。爲了限制總統權力，參議員一反討論『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時的態度，一致主張採取責任內閣制。很顯然的，沒有袁世凱就沒有『統一』；沒有責任內閣制就沒有政客的地位。這是非常現實的事情，已經用不着爭論了。

至於建都南京，問題就比文字約法困難而複雜。約法的效力在將來，袁世凱可以不爭，但建都問題迫在眼前，却是袁世凱所必爭的。袁世凱之不欲南來，在他發表政見的宣言裏面就已經附帶表示過了。他的理由是『北方秩序不易維持，東北人心未盡一致。』袁世凱所持理由和態度，在南方各地產生十分重大的影響，使南京方面無法在這個問題上堅持下去。

首先是參議院議員，亦即各省都督府代表，有一大部份主張將就袁世凱，經過谷鍾秀、李肇甫等一班立憲黨人的提議，在二月十四日，參議院作了『因時制宜』的討論，竟以二十票對八票的多數，可決臨時政府設於北京之議。但因爲孫中山堅決反對這個議案，諮議覆

議，第二天才在一場激辯之後，以十九票對七票重新可決臨時政府仍設南京。

但是當南京政府派出的迎袁專使蔡元培、汪精衛、宋教仁、魏宸組、紐永建等剛於二月二十五日出發北上的時候，原來響應武昌起義的南北各地都督即紛紛通電主張建都北京。其中還包括副總統黎元洪和民軍清江浦及南京的駐軍長官，一唱百和。江蘇都督莊蘊寬（程德全已任南京政府內務總長）甚至抗議孫中山諮請參議院覆決建都南京，認為「立法爲行政所侵，不能保其獨立，民國開此惡例，尤可寒心」。這時候孫中山與黃興等一班革命黨領袖已經成爲「少數人」，完全陷於孤立。他們的妥協政策使他們在政治的最後一道防線上，竟不能面對這麼多都督和倚爲代表國民意見的都督府代表或議員，一步一步失敗下去。

北京一班舊軍閥舊官僚和帝國主義的外交團，當然都站在袁世凱一方面，作袁世凱的奧援，儘管孫中山和黃興不斷打電報催袁世凱南下；並且警告袁世凱不要以清帝委任爲口實，逕在北方另組臨時政府，但是袁世凱回答他們說，共和政府固然不能由清帝委任爲組織，可是「現在北方各省軍隊暨全蒙代表皆以函電推舉爲臨時大總統，」原可自組政府。僅僅因顧及南北分裂，故爾「未遽組織」。北方「險象環生，大局益危」，如果堅執要他南來，他寧願

不做總統（事實上的臨時政府既早已成立，當選總統以後，又早已開始用「新舉大總統」名義在北方發號施令）。

當迎袁專使蔡元培等一行到達北京以後，北京各機關團體紛紛派代表呈遞說帖，北方將領紛紛致電呼籲，反對袁世凱南下。袁世凱本人與專使們談話却放出狡猾手段。他表示「極願早日南行」，甚至討論到留守北方的人選和南行路線，說他準備乘京漢車赴漢，先訪黎元洪，再行乘輪赴京云云。蔡元培等遂也深信不疑，認爲袁的表示「本與培等北來目的，決無差池」。正在這個時候，袁世凱在暗中布置了一幕活劇。二月二十九日晚上，袁世凱身邊的「趙子龍」——駐北京陸軍第三鎮統制曹錕部隊忽然暴動起來，在東安門及前門一帶放火搶劫，全城槍聲四起，通宵達旦，專使行館亦被騷擾，專使們僅以身免，連夜避入東交民巷。第二天，同樣的事件又在通州、天津、保定相繼發生。北京外交團配合行動，議決增調軍隊入京護衛。日本首先由山海關及南滿分調駐屯軍隊一千餘人在秦皇登陸，向北京推進，更使形勢顯得異常嚴重。當時南京陸軍總長黃興即電請各省出師堵難，袁又以「各國聯軍在京，恐滋誤會」，拒絕了。緊接而來的是段祺瑞、姜桂題、馮國璋三軍統通電主張「臨時政府必

應設於北京，大總統受任必暫離京一步，統一政府必須旦夕組成」。袁世凱本人則提議請副總統黎元洪到南京代表就職，他仍暫留北京，六個月以後再行南下。

這時在北京的迎袁專使已經看得目瞪口呆，沒了主意。於三月二日致電南京政府說：

北京兵變，外人極爲激昂，日本已派多兵入京。設使再有此等事件發生，外人自由行動，恐不可免。培等睹此情形，集議以爲速建統一政府爲今日最要問題，餘儘可遷就，以定大局。

三月四日午後專使團開會，又決定向南京建議：「一、消滅袁君南行之要求；二、確定臨時政府之地點爲北京。」經唐紹儀，汪精衛與袁世凱最後商議結果也提出同樣辦法，並由專使團推定宋教仁、紐永建、王正廷、魏宸組四人，由袁世凱指定唐在禮、范源濂二人同到南京商量遷都組閣等具體問題。南京政府至此亦同樣沒了主意。在無可如何之中，於三月六日由孫中山提請參議院通過了一個收梢的辦法，允許袁世凱在北京就職，打電報向南京參議院宣誓，參議院收到宣誓電報，即承認大總統業已正式就職。

袁世凱接受這個辦法，於三月十日在南京迎袁專使參加下，在北京宣誓就職，並將誓詞電致南京參議院，袁世凱政權從此「合法」產生。三月十一日，孫中山公佈了參議院討論已

卅二天的臨時約法（後來孫中山在五權憲法演講中說：「在南京訂出來的民國約法裏頭，只有「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那一條是兄弟所主張的，其餘都不是兄弟的意思，兄弟不負那個責任」）。三月二十三日經南京參議院同意，袁世凱任命了他的老友而兼爲同盟會會員的唐紹儀爲新政府的內閣總理。唐紹儀於三月二十五日到南京組織了所謂責任內閣。在唐內閣的十一個閣員中，總理唐紹儀，教育總長蔡元培，工商總長陳其美，司法總長王寵惠，農林總長宋教仁，都是同盟會份子，時人稱之爲「同盟會中心內閣」。但掌握實力的三個總長，內務總長趙秉鈞，陸軍總長段祺瑞，海軍總長劉冠雄，都是袁世凱的黨羽。財長熊希齡則是個擁護袁世凱、反對同盟會的共和黨員。

四月一日南京臨時總統孫中山宣佈解職。四月五日，參議院議決遷都北京。十餘年來中國人民會爲之不斷流血犧牲而準備的革命，由於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領導與妥協政策，至此遂以軍閥官僚的大團圓告其結束。

第四章 大獨裁者與政黨政治

中國政治上有一個最富趣味的事實，就是每當朝廷下詔求言的時候，一定有很多卜載塞窗的苦讀之士和士大夫爭先恐後向皇帝上書獻策，以爲當今的聖主明君就要給他們一個陞官發財的好機會了。這個傳統到了清末就蛻化而爲對於立憲政治的期待。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德宗接受康有爲變法維新的主張，一時維新志士大爲活躍。一九〇六年（光緒三十二年）朝廷下詔預備立憲，而要求實行憲政的會社風起雲湧，極一時之盛。一九一一年革命軍起，各種政團隨之出現。一九一二年袁世凱上台，南京政府交給他一部臨時約法，規定實行責任內閣制，於是一班官懸十足的人又以爲鴻鵠將至，開始大規模組黨組派，準備在這個『憲政』時期大顯身手一番，真不知忙煞了多少『政治慾』特別強的『志士』！

『政黨政治』本是從外國搬回來的洋八股之一種，搬回來行得通嗎？似乎幾十年都沒有鬧得清楚。本章所記，乃是這套洋八股和中國政治交手第一回合的故事。

一 政黨政治的幻像與各黨各派

南方的革命黨人和立憲黨人把袁世凱捧上總統寶座的時候，特別強調約法爲總統所必須遵守的大法。孫中山以此爲辭職三條件之一，參議院在給袁世凱就任誓書的答詞中，也說：「尤不得不拳拳致勉者：臨時約法七章五十六條，倫比憲法，其守之維謹！」他們這樣看重約法，顯然都認爲有一部約法就可約束總統，使政治照着他們預定的軌道運行，他們的政治地位也就確定了。從這個假定的前提出發，各種各色的政治人物開始安排他們的陣容，出現了各黨各派的大組合。

這個組合過程實質上是革命黨與立憲黨由分而合，合而復分的鬥爭過程。滿清晚年，因爲清廷先是拒絕立憲，後又拖延立憲，立憲黨人已很感失望；在失望之餘，忽見皇上坐不穩江山，即紛紛放棄君主立憲的主張，和作爲革命黨的同盟會廣泛地携起手來。從起義到南京政府時期，是兩大派別由分而合，而又幻化爲各黨各派的分化與結合的混亂時期。

在這個時期中，同盟表會面上是執政黨，組織由秘密而公開，並且吸收了大批新黨員，

黨勢極一時之盛；實際上，這個由反滿各黨派人士結合起來的統一戰綫組織，由於目標消失，正在分裂之中。武昌起義以後，由湖北人組織起來以擁護黎元洪在政治上爭地位爲目的的政團『民社』，其參加份子如藍天蔚、王正廷、孫武、劉成禹、吳敬恆等，就都是同盟會的黨員。同盟會主要理論家章炳麟則早在一九〇九年，當章氏在東京主持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的時候，就因爲經費困難，不能按期出版，怪孫中山逍遙海外，不予接濟，憤而印發傳單宣佈孫中山罪狀，要鬧分裂。到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下旬，正當漢陽戰事猛烈之際，章炳麟即在上海通電發起組織『中華民國聯合會』。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政府成立以後，『中華民國聯合會』亦隨之於一月三日宣告成立。二月一日，南北和談尚在僵持之中，章炳麟首先通電主張選舉袁世凱爲總統並建都北京。其後復與張眷一派的清末立憲團體『預備立憲公會』聯合，以蘇浙人士爲中心，改組爲『統一黨』。統一黨以反對同盟會爲職志，程德全、熊希齡、唐文治、湯壽潛等一班舊官僚皆黨中健者，所以不久就與袁世凱沆瀣一氣了。當時追隨孫中山左右的汪精衛也和袁世凱黨羽楊度等另組『國事共濟會』，以孫幕中人而兼爲袁幕中人。其他原隸同盟會而脫離黨組織參加各種政團的人還多得很多。

在這個時期，立憲黨人的老團體亦告瓦解而滋生許多新團體。湯化龍林長民等組織「共和建設討論會」，孫洪伊等組織「共和統一黨」，籍忠寅周大烈等組織「國民協進會」，谷鍾秀、張耀會、殷汝驪等結合一班由同盟會分裂出來的份子，擁蔡鍔與王芝祥為首領，組織「統一共和黨」，此外小黨派還有陳錦濤、徐謙、許世英、林志鈞等的「國民共進會」（伍廷芳為會長，王寵惠為副會長），溫宗堯、王人文等的「國民公黨」，董之雲等的「共和實進會」，張國維等的「民國公會」、潘宗堯、潘鴻鼎等的「國民黨」（當時的親美派組織，與後來由同盟會改組的國民黨是兩回事），以及「共和促進會」、「共和俱進會」、「國民新政社」、「自由黨」等。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四月，參議院遷往北京，代行國會職權。從這個時期到第一屆國會成立前後，隨着政爭的激烈，各黨各派林立之局逐漸澄清，合併為四黨。首先是谷鍾秀張耀會等的「統一共和黨」與東北議員吳景濂等結合，在參議院佔得二十五席，於各佔四十四席的同盟會與統一黨之間取得舉足輕重的地位。繼之，「統一黨」爲了適應袁世凱組織強大與黨以對抗同盟會的要求，於五月五日合併「民社」及潘鴻鼎等的「國民黨」，籍忠寅、

周大等烈的「國民協進會」，張國維等的「國民公會」，另組「共和黨」，推黎元洪爲理事長，揭櫫「國權主義」，其實則以擁袁爲己任。但爲時不久，「統一黨」首領章炳麟又宣言與「共和黨」分家，仍舊維持其統一黨的組織。

共和黨的成立使同盟會聲勢頓減。七月以後，宋教仁等爲了爭取未來國會選舉的勝利，準備從事「合法鬥爭」，不願黨員反對，把同盟會綱領中的革命部份大加修改，取消「男女平權」的主張，「平均地權」改爲意義含糊的「注重民生政策」——不反封建，「力謀國際平等」改爲「維持國際和平」——不反帝；而以「新舊合作」，「朝野合作」爲號召，拉攏「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等立憲黨人的小組織來和同盟會合作，於八月廿五日正式建立「國民黨」。在各省遍設支部，以爲運動選舉之用。

國民黨組成以後，因爲合併了「統一共和黨」的議席，在參議院中佔有六十席，而共和黨仍只保有前統一黨的四十席，議場形勢決定於其餘廿餘席的動向。於是共和建設討論會的湯化龍林長民馬上活躍起來，進行組織第三黨。適梁啓超於十月返國，與袁世凱妥協，湯、林等即與孫洪伊等「共和統一黨」以及其他北方政團「共和俱進會」、「共和促進會」，「

國民新政社』等聯合，擁梁啟超爲首領，組織『民主黨』。

因此在國會議員競選中，就形成了共和黨、統一黨和民主黨共同對抗國民黨之局。當時各省政權大半操在或新或老的革命黨手裏，選舉結果，國民黨籍的參議員和衆議員共佔了三百九十二席。共和、民主和統一三黨合計不過共佔二百二十三席。當時袁世凱因爲民主黨黨領袖上了一個秘密條陳，頓悟疏忽選舉之失策。而當時國民黨却志得意滿，宣傳組織『國民黨內閣』，由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使袁世凱更爲嫉視。共和、民主、統一三黨本來都是希望獲得袁的支持的，這時更曲承袁氏意旨，齊一步驟，於一九一三年五月廿九日合併爲『進步黨』，以之爲對抗國民黨的政府黨。於是四黨並立之局，至此乃復循同盟會與立憲黨的老系統，一變而爲兩黨對立。不同的是滿清時代同盟會與立憲黨之爭在於革命與立憲的基本原則，而國民黨與進步黨則是同在擁袁的立場上對立；國民黨擁袁但企圖實行責任內閣制以削弱袁的權力，進步黨擁袁並贊成袁集中權力，只求能『分我一杯羹』。

『政黨政治』的幻想在這時候達到了它的頂點，這些政黨都以爲『我們』既已承認你袁世凱做最高元首，『你』也一定能反過來承認『我們』在實際政治中的地位；這些政黨都幻

想着在袁世凱的最高統治下，他們可以用『合法』的方法，來爲自己取得或分得所嚮往的權力。『革命』，在他們看起來是早已過去了的事，至於廣大人民在這一『改朝換代』中得到些什麼？想着些什麼？那更是他們所無暇理會的。

二 『責任內閣制』

袁世凱在實際上把革命以後時局的發展控制在自己手裏。當各黨各派忙於分裂、合併、討論『責任內閣』的時候，袁世凱却謹慎地注視着革命在各省所造成的局勢。南方有六七省地盤仍爲國民黨人所掌握，其餘亦大部份在非直系軍人手裏，對於袁的『統一』大業，這是最大一層障礙。在他就任總統的二十天以後，三月三十一日（一九二二年民國元年），袁世凱表了一通『訓勉軍人令』，強調『服從統一命令，保持地方秩序』。四月廿九日在參議院演說，又宣佈採取收束軍隊的步驟。同時暗中派出了大批特工人員分赴各省戰略要點組織軍隊，準備一旦有事即用來鎮壓異己的反抗。袁世凱手下第一號特工頭子，內務總長趙秉鈞從來不出席唐紹儀的國務會議，宣稱『現在維持秩序之事諸關重要』，露骨地說明了他埋頭佈

置特務的事實。

可是這時做內閣總理的唐紹儀，却正在起勁地推行他的「責任內閣制」，處處強調他的「責任」，總統府交下的公事，唐以爲不可行，卽行駁回，甚至還跑到總統府去向袁世凱力爭。袁世凱本來把唐紹儀看作自己的部屬，現在唐做了總理便竭力與他爭權，袁世凱實在容他不下。有一次面紅耳赤之餘，袁憤然對唐紹儀說：「我老了，少川，你來做總統吧！」唐紹儀既與袁世凱對立起來，在內閣內部又以借款問題遭遇到財長共和黨人熊希齡的掣肘，在外部更有積極擁袁的統一黨首領章炳麟一流人的攻訐，唐內閣早有動搖之象。到了六月裏，唐紹儀站在國民黨一邊堅持王芝祥督直，國民黨隱然有掌握北方局勢的企圖，袁世凱就再也肯容忍了。唐紹儀電邀王芝祥到北京，袁世凱便指使所謂直隸五路軍界出頭通電反對，旋即藉口軍界反對，於六月十五日改派王芝祥赴南京遣散軍隊。唐紹儀拒絕改派命令，袁就把未經副署的命令逕行發表，正面予唐紹儀以打擊。唐遂於次日憤而辭職，出走天津。但唐的辭職不過爲了爭一點面子，實際上還是擁護袁世凱的。當袁世凱派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到天津去慰留唐紹儀的時候，唐對梁說：「今國家大勢，統一中國非項城莫辦，而欲治理中國，

「非項城誠心與國民黨合作不可。」

唐紹儀辭職以後，國民黨人認爲聯合內閣不能齊一內部意見，甚至進一步倡議組織一黨負責的責任內閣。共和黨知道本黨沒有組閣希望，又怕國民黨人果真起而組織一黨內閣，乃因而倡議組超然內閣。此說恰合袁世凱脾胃，馬上接受，並提出當時著名買辦外交家陸徵祥來，徵求參議院同意。國民黨議員雖極端反對，但共和黨和統一黨議員都投了贊成票，袁世凱遂於六月廿九日任命陸徵祥組閣。七月一日，唐內閣的國民黨四閣員蔡元培、王寵惠、宋教仁、王正廷宣佈辭職。國民黨閣員辭職以後，共和黨閣員熊希齡和唐紹儀的親戚施肇基亦不安於位，相繼辭職。到七月十八日，陸徵祥便帶着他和袁世凱商量好的閣員名單出席參議院，這個吃外國麵包長大的「外交家」，本來就只會說外國話，跟外國人應酬交際，這時更是滿腦子「超然主義」，除了開菜單、作生日，根本不談政治，使得那些曾經投他贊成票的議員大吃一驚，原來這位超然總理是個全然無用的廢料！因而對他所提出的六位閣員一律否決，以爲不信任的表示。這是參議院第一次的行使「否決權」。

雖然在唐紹儀下台以後，早就有了一種傳說流行在各地，說唐紹儀之辭職是袁世凱準備

實行專制的前奏，以致袁世凱不能在批准唐紹儀辭職的同日，發表「解釋謠言」的通電，把「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見於中國」的誓言重申一次。當時各黨各派却一點也沒有因此稍存警惕，擁袁初衷始終不渝，繼續向袁世凱的槍刺底下作「合法鬥爭」，企圖實現他們的可憐的幻想。但是，相反的，在議員們的合法鬥爭的迷夢中，袁世凱却對否決六閣員事件大大警覺起來。

六閣員被否決後，陸徵祥內閣一時組織不起來，袁世凱就施展手段對付參議院，讓各黨派來經歷一次軍閥武力的攻險。首先由「北京軍警特別聯合會」通電痛罵參議院只爭黨見，不顧國家危亡，同時致函參議院提出警告。接着就有袁世凱所收買的南方軍人鄧玉麟、閻鴻飛等聯名指摘參議院。二十三日，袁世凱另提國務員六人徵求參議院同意。廿四日又連續有以各種軍界團體名義發佈的傳單、信件，對參議員大肆恐嚇，並用電話通知個別議員說，若再不犧牲黨見，軍警要對他們不住了。二十五日上午，「軍警會議公所」舉行特別會議，甚至有人主張武力解散參議院。同日下午姜桂題、段芝貴等又以聯絡感情為名招待參議員，新聞記者和政界要人，一面否認軍警有干涉之意，一面在席上就由北京時報經理陳紹唐挺身而出。

來痛責參議院，並且說「明日再不將六國務員通過，當宣佈議員死刑」。在這次風潮中，統一黨首領章炳麟也出來替軍警助威，與張紹曾孫毓筠等聯名致電黎元洪，請黎一致主張「宜請大總統便宜行事，勿容拘牽約法以待危亡」。

到二十六日參議院對袁世凱於二十三日所提六國務員舉行投票，雖然勉強可決了其中五人，却仍不肯服氣，到二十七日又提出彈劾陸總理失職案。袁世凱乘機叫陸徵祥從此稱病不理政務，而讓他的更狠毒的死黨，內務總長趙秉鈞代國務總理。這一回袁世凱看穿了各政黨的弱點，便進一步自己出面加以訓斥了。他於二十九日通令「勸告」各政黨說：「方今民國初興，尙未鞏固，倘有動搖，則國之不存，黨將焉附？」本來是袁世凱要撕毀約法，破壞議會權力，實行專制，現在却把文章通通做成各黨派鬧意見，不以國家爲重了。

三 國民黨的幻想

袁世凱和唐內閣的鬥爭以及他和參議院的鬥爭，已經使袁的猙獰面孔逐步揭露。爲了把那副醜態看面孔粉飾一下，並爲了進一步軟化革命派，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八月袁世凱邀

請孫中山、黃興、和黎元洪入京舉行巨頭會議。孫、黃、黎三人是當時極負重望的人物，他們和袁世凱聚首一堂顯然足以造成一種全國聯合的印象，特別對國民黨人具有麻痺羈縻的作用。當時國民黨的基本決策是『新舊勢力合作』，質言之，亦即與封建勢力合作。袁世凱發出請帖以後，國民黨方面雖然也有顧慮，孫黃二人仍舊接受了袁的邀請。只有黎元洪因與袁世凱合謀殺害武昌首義人物張振武大受各方責難（張振武甫於八月十四日在北京被處死），不敢入京，但黎並非主要客人，孫黃二人到了，袁世凱的計劃就成功了。

孫中山於八月廿四日首先到達北京，受到袁世凱的隆重的招待。三日一大宴，兩日一密談，這位革命首領居然鑽進了袁世凱的圈套。孫中山在請辭臨時總統以後，本來就抱定主張『盡讓政權於袁氏』。這時更只是口口聲聲說要在十年內建築二十萬里鐵路。他在一次演說中他說：

鄙人之意見，現在政治之事已有袁大總統及一般國務員担任，鄙人從此即不廁身政界，專求在社會上作成一種事業。……鄙人所計劃者非他，即建築鐵路是也。

孫中山不但以十年內建築二十萬里鐵路自期，並且對袁世凱說：『十年以內大總統非公莫屬』，請求袁世凱十年以內練成陸軍一百萬。和孫的坦白爽直完全相反，袁是十分冷靜，

十分深沉的。見孫中山態度如此熱烈，袁世凱就更表示「融洽」，九月九日特頒命令：「特授孫文以籌劃全國鐵路全權。」凡孫中山有所主張，袁世凱無不隨口應和，以致連孫中山自己也不能不驚異起來。有一次他禁不住向梁士詒說：『我與項城談話，所見略同。我之政見，他亦多能領會。惟有一事我至今尙疑。中國以農立國，倘不於農民自身求澈底解決，則革新非易。欲求解決農民自身問題，非耕者有其田不可。我說及此項政見時，意以爲項城必反對。孰知彼不特不反對，且肯定以爲事所當然，此我所不解也！』

孫中山在北京留約一月，與袁世凱會晤十三次。回到上海以後，十月五日在上海國民黨歡迎會上演說，仍對袁世凱推崇備至。他說：

當南北統一頃，余即推薦袁大總統。因平日羨慕其爲人，在前清官場中，項城有真實能力，勇於幹事，迥異常庸。彼在北洋練兵卓著成效，故此人而入民國，亦必爲民國重要人物。當南北戰爭時，袁項城擁護君主立憲，與吾人意見不合，故不能合力作事。後袁贊成共和，南北統一，袁與吾人意見已同。惟南方人士尙有疑其非出於真意，目民國爲假共和者，余則決其出於真誠之意。蓋凡經宣布政見之後，即無返悔之餘地。大丈夫作事，能相信即從之而行，故余推薦袁項城於民國，得參議院之同意，舉爲臨時總統，遂有統一之好結果，而民國入於安寧之域，享莫大之幸福。……

余在京與袁總統時相晤談，討論國家大事，頗入精微。故余信袁之爲人甚有肩膀，其頭腦亦甚

清楚，見天下事均能明澈，而思想亦很新。不過作事手腕稍涉於舊，但辦事本不能盡採新法。……欲治民國，非具有新思想舊經驗舊手段者不可，而袁總統適足當之。故余之推薦項城並不謬誤。

正因為孫中山對袁世凱如此深信不疑，推心置腹，他到北京以後，立即打電報給黃興說：

到京後與項城接談二次，關於實業各事，彼亦向有計劃，大致不甚相遠。至國防外交，所見畧同。以弟所見，項城實陷於可悲之境遇，絕無可疑之餘地。振武案實迫於黎之急電，非將順其意，無以副黎之望。弟到此以來，大消北方意見，兄當速來，則南方風潮亦可止息，統一當有圓滿之結果。

九月十一日，黃興到達北京。在當時國民黨內部，黃興是一個無原則的右派首領。臨時政府北遷以後，他以『南京留守府』名義統率着南方一部份軍隊。早在六月間他就自請撤消南京留守府職務，不給費把所部軍隊完全遣散，以示擁護中央的誠意。這次到北京，也是帶着滿肚子誠意來的。黃興的興趣不完全在實業或築鐵路，他抱着一種要把北京政府全面黨化的理想，遂人便勸其加入國民黨。他勸過楊度，甚至還勸過袁世凱，請袁世凱來作國民黨領袖。當趙秉鈞經過國民黨人同意，正式繼任國務總理以後，黃興又乘時遍勸全體國務員加入

國民黨，他以為政府首要全加入了國民黨，政治就有辦法了。結果雖然楊度、袁世凱以及海陸軍部長等三四人沒有入黨，可是趙秉鈞和其他大多數國務員個個都填了國民黨的入黨誓願書，儼然變出一個『國民黨內閣』來了。

九月廿五日，袁世凱公布他和孫黃協議的『內政大綱』八條。從此國民黨在參議院裏面和袁世凱的鬥爭也完全停止了。國民黨人滿以為他們將能與袁世凱進入一個和平合作的憲政時期，因而國民黨的另一首領，政黨政治的積極主張者宋教仁便展開了空前的活動，合併了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和共和實進會等，吸收了無數的投機政客與封建餘孽入黨，在一九一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一三年二月的國會選舉中，獲得了壓倒多數的勝利。

國民黨於志得意滿之餘，聲言將以多數黨資格組閣，並預定由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宋教仁這時更遍歷湖南、湖北、安徽、南京而復返上海，到處發表演說，批評時政，把他平日的組閣抱負全部發揮出來。袁世凱看到國民黨聲勢如此浩大，十分驚異的對楊度說：『以暴動手段奪取政權尚易應付，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權，置總統於無權無勇之地，却厲害多了！』其實這還是一句假話。國民黨自己這時也沉溺在『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權』的幻想中，但不堪

袁世凱出手一擊，就把這幻想打得粉碎。

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午後十時，宋教仁由上海搭車北上，在上海車站遇刺。廿二日逝世。在他的遺囑上還寫着：「望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會確立不拔之憲法，則仁雖死猶生。」

宋教仁被刺死以後，袁世凱即電令江蘇都督程德全和民政長應德閔「窮究主名，務得確情，按法嚴辦」。四月廿六日程德全和應德閔宣布全案證據，原來主使暗殺的就是袁世凱的特務頭子和國務總理趙秉鈞。這時趙秉鈞已經備受責難，終於五月一日引嫌辭職，袁世凱即以陸軍總長段祺瑞代理國務總理，不久且仍調趙秉鈞爲直隸都督。

四 絕望的反抗

宋案發生以後，舉國沸騰。袁世凱知道事態惡化，無以自解，遂毫不猶豫，積極準備戰爭。四月七日即由參謀部下秘密動員令，着張勳與山東都督周自齊兩部候令待發。並於四月二十六日，即宋案證據全部暴露之日，以「善後」爲名，與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

簽訂協定，借款二千五百萬鎊，而以去年十二月曾經臨時參議院通過報告於國會。佔有國會多數議席的國民黨議員立即起而反對，並由參議院議長張繼王正廷致電各國阻止付款。但進步黨議員一面認爲借款『手續不合』，一面又向袁世凱分取借款作黨費，堅決支持袁世凱反對國民黨，且迫使張王聲明他們的通電全係個人態度。在國會外面，袁世凱又授意北方各省都督聯名通電痛責國會反對借款爲『不顧大體，無理取鬧』。隨着壓力的增加，國民黨議員反對借款的微弱呼聲很快就消失了。

和袁世凱的着着準備相反，在宋案發生以後，國民黨突從妥協的迷夢中被驚醒，內部陷於一片混亂之中。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二月孫中山爲着實現他的二十萬里鐵路計劃到了日本，他在日本發表談話說：『余已力辭大總統候選人，黃君（興）亦必力辭，此事終不能不煩袁君。』但當孫中山正要返國的時候，發生了宋教仁被刺事件。三月底，孫中山回到上海，他對袁世凱的幻想完全破滅，認爲『非去袁不可』，不顧一切，主張立即與師討袁，發動第二次革命。但是這時的國民黨再也不是清末從事反滿革命的同盟會了。由於澈裏澈外的妥協政策，國民黨早已脫離了人民，內部充滿着投機份子和封建官僚。人民對國民黨失望、

冷淡，而國民黨內部又因宋案產生了分歧的意見：反抗派擁護孫中山的主張，以江西都督李烈鈞爲最堅決；懷疑派以黃興、陳其美爲代表，對武力無信心，主張聽候法律解決；國會派捨不得離開北京的議席，幻想聯合進步黨據『法律』以倒袁。全黨沒有一個統一的決策，抱持各種不同意見的人採取着各種不同的行動。反抗派在上海開會，不斷派人四出連絡；懷疑派在猶疑不決之中，而國會派則仍在北京繼續其『合法鬥爭』；以至一面正在爭議，一面調兵遣將之說已盛傳於外。對於國民黨反抗派的動向，袁世凱一點不放鬆。五月二十四日上海時報載北京專電『袁總統令傳語國民黨人』說：

（袁世凱說）『現在看透孫、黃，除攘亂外無本領。左又是搗亂，右又是搗亂。我受四萬萬人民付託之重，不能以四萬萬人之財產生命聽人搗亂！自信政治軍事經驗，外交信用，不下於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嘗不願，然今日誠未敢多讓。彼等若敢另行組織政府，我即舉兵征伐之！國民黨詆非盡是莠人，然其莠者，吾力未嘗不能平之！』語時有梁士詒、段芝貴、曾彝進在座，梁屬曾以個人資格往告國民黨人，袁謂：『卽說是袁府亭說的，我當負責任。』

本是國民黨要舉兵討袁的，現在却是袁世凱先發制人，決心與國民黨決裂。藉口李烈鈞、柏文蔚、胡漢民會通電反對借款，說他們不服從中央，於六月九日免李烈鈞江西都督職，

十四日免胡漢民廣東都督職，三十日免柏文蔚安徽都督職。湖北的黎元洪是早已附袁的。湖南的譚延闓在猶移畏葸之中，但袁世凱仍不放心他，爲了免除後患，先派特工人員炸毀湖南軍械局，使湖南的反抗派無可憑藉。當時廣東有陳炯明與胡漢民對立，安徽柏文蔚部下軍隊大部份已被袁世凱收買，唯一難制的就是尙能把握江西一部份力量的李烈鈞。所以袁老早就派段芝貴的第一軍李純部向九江進兵，決心撲這一滅部份非袁系軍隊。

在免職令發表以後，李烈鈞本來也和胡漢民柏文蔚一樣，已經遵令解職，到這時候李烈鈞部已被迫退到湖口，終不能不起而接受袁世凱的挑戰。遂於七月十二日與旅長林虎等發出討袁通電，自稱『討袁軍』。戰事既起，黃興因向來不主武力討袁太受黨人責難，自告奮勇趕赴南京，強迫蘇督程德全於十五日宣布討袁，響應李烈鈞的『討袁軍』。至此，袁世凱即大張撻伐，於七月二十二日宣布『討伐令』。

袁世凱的軍事計劃是早就已經擬好了的，以馮國璋、張勳兩部進攻南京，段芝貴率李純等部進攻江西，由鄭汝成、湯薌銘率海軍協助蘇、贛兩省作戰。在國民黨影響下的安徽、湖南、廣東、福建、四川五省雖然也先後宣布獨立，終以武力究屬有限，且又各懷疑懼，不能

一致行動，在江西、南京兩處戰敗以後，又紛紛宣布取消獨立。不到兩個月，所有殘存在南方各省的國民黨軍隊全部被袁世凱打垮了，長江流域盡入北洋軍閥掌握之中。

事後孫中山致書黃興，檢討當時國民黨內部情況說：「癸丑（民國二年）之役，文主之最力，所以失敗者，非袁氏兵力之強，實因黨人渙散所致。」

國民黨的妥協政策造成了內部的「渙散」，於是經過辛亥革命所造成的聲勢浩大的空架子，在封建勢力的新首領袁世凱一擊之下，完全崩潰了。孫中山被迫着不能不逃到日本去，重新號召組織「中華革命黨」。在國內，則給袁世凱放開了一條稱帝的大道。

五 幫閒者的結局

在北京的國民黨國會議員也和宋教仁一樣是至死不悟的。他們仍舊對袁世凱存着幻想，以「法律倒袁」解嘲，繼續留在北京，靜候袁世凱對他們開刀。但是在另一方面，堅決擁護的共和、民主、統一三黨則爲了在國會壓制國民黨勢力，建立了反國民黨的大聯合，宣布合併爲進步黨。國民黨人居然也還在夢想着聯合進步黨共同進行「法律倒袁」的大計。而進步

黨則視國民黨爲大敵，爲了爭取在國會的優勢地位，拚命分化國民黨，用各種各樣的小組織引誘國民黨議員脫離其本黨的約束，那些動搖、投機而又各存幻想的國民黨議員竟因此弄得四分五裂。在討袁軍起義以後，南方國民黨人再三電請議員南下，可是議員們都觀望不肯離去，並且熱心地在北京參加了憲法起草委員會的『制憲』工作。

袁世凱原是痛惡國會的，這時却還要保存這個國會以便選舉他作正式總統。要是議員都跑到南方去了，不惟總統選舉不成，且將助長南方討袁軍的聲勢。所以他儘管一面任意捕殺國民黨議員，一面又通令保護議員，聲稱『尊重』約法上議員應有的特權，使得那些執迷的議員真以爲有那麼一回事。進步黨人是直接繼承着清末的君主立憲黨人的傳統的。他們反對孫中山的武力倒袁運動，袁世凱縱有不對，亦只可循法律途徑解決，不應該動武。他們夢想制定一部『完美』的憲法，將就袁世凱的北洋舊系統，因勢利導走上『憲政軌道』，實現他們心嚮往之的『政黨政治』。因此進步黨人就加緊協助袁世凱進行『戡亂』，至於捕殺幾個國民黨議員，他們是以爲當然的。

在第二次革命漸近尾聲的時候，由於進步黨人在這次事件中和袁世凱合作得很好，袁世

凱就向國會提出任命進步黨人所推戴的熊希齡組閣。當時國民黨人正想巴結進步黨，所以熊希齡的任命非常順利就通過了。進步黨人受寵若驚，真以為遇到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幾經奔走之下，九月十一日熊希齡組成了他的『第一流人才與第一流經驗的內閣』。昔爲君主立憲派要角今爲進步黨首領的梁啓超、張謇、汪大燮都以『第一流人才』的資格參加這個內閣，佔居了幾個閣曹總長位置。

熊希齡的『第一流人才』內閣也和唐紹儀的『同盟會中心內閣』一樣，主要各部仍都掌握在袁世凱嫡系人物手裏。但袁世凱仍恐怕進步黨人靠不住，在熊內閣組成以後一個禮拜就派他的秘書長兼交通銀行總理梁士詒出面，用金錢與地位聯絡一部份議員，組成了一個『國民黨』，作他直接指揮的打手，以便挾持國會進行『選舉』正式總統。

當時憲法起草委員會正在起草『大總統選舉法』。費時兩月，尙未完成。公民黨的打手們就在國會裏面倡議先舉總統後定憲法，說是非有正式總統外國不易承認。一班議員也彷彿以爲不經外國承認，民國就會立不住脚，紛紛附議。而國民黨議員怕袁世凱解散國會，爲了緩和空氣，暫時苟安，也跟着贊成。於是十月四日由國會草草頒布了『大總統選舉法』，十

月六日便依照這個選舉法規定，由參眾兩院議員組織「總統選舉會」，進行投票手續。

袁世凱預定要在這年雙十節坐上正式總統椅子受百官朝賀，就在選舉這天派出便衣軍警數千人，自稱「公民團」，包圍會場，聲言「今日非將公民所屬望的總統選出，不許選舉人出議場一步」。一部份保持着正義感的議員這時候還想以不投票來抵制袁世凱，以至最初兩次投票，袁世凱雖得票較多，但都不够法定四分之三的多數。第三次投票時，就第二次得票較多的袁世凱與黎元洪二人舉行決選，袁世凱始以得票過投票人之半數當選。議員們從上午八時到下午十時，整日忍飢挨餓，一直到選舉結果報告以後，才在公民團「大總統萬歲」的歡呼聲中離開議場。這就是國民黨國會派所謂「法律倒袁」的結果。袁世凱當選了正式總統，這一班至死不悟的議會夢想者的惡運也就隨着到了眼前。

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十月十日袁世凱就任正式總統，十月十六日即咨請國會於憲法成立以前立即增修「臨時約法」，說是臨時約法限制過苛，議員干涉過甚，甚至說：「本大總統一人一身之受束縛於約法，直不啻胥吾四萬萬同胞之身命財產之重同受束縛於約法！」在這個增修案內，袁世凱要求取消參議院的同意權，增加總統的緊急命令權和財政緊急處分

權。當時國會認爲正式憲法正在草擬之中，約法無增修必要。但袁世凱之抨擊約法，也就正是表示了他對正式憲法的主張。

在諮請增修約法以後的第二天，十月十八日袁又咨文憲法會議要求「憲法公布權」，指摘十月四日憲法會議運行公布「大總統選舉法」，違背約法規定。憲法會議又只得以憲草尙未完成敷衍他，不敢作正面答覆。

袁世凱這時一不做二不休，一步緊一步的向議會進攻。隨即又於十月二十四日派遣了施愚、顧鰲、饒孟任、黎淵、方樞、陳樹德、孔昭焱、余榮昌等八人要求列席憲法會議及憲法起草委員會陳述意見。憲法起草委員會因爲依照該會規則，僅許國會議員旁聽，其他無論何人，不特無發言權，且無旁聽權，拒絕袁世凱派人參加。袁世凱在第二天（十月二十五日）就使出他的最後的本錢以與國會鬥爭，通電各省軍政長官，要求一致反對憲法草案，說「民黨議員干犯行政，欲圖國會專制」。於是各省都督民政長以及其他文武官吏紛紛通電指斥，他們都撇開憲法本身不談，只是力主解散國民黨，撤消國民黨議員，撤消憲法草案，解散憲法起草委員會，解散國會。

經過這一連串發生的事件，一部份進步黨議員感到形勢不對，就和一部份國民黨議員聯合，在十月二十一日合組了一個『民憲黨』，宣言不爲金錢勢力所屈，以貫徹民主精神，擁護憲草爲職志。但是這已經完全沒有用了。十一月四日袁世凱根據各省軍政長官的主張，藉口在南昌李烈鈞官署查獲國民黨議員與李往來密電數十件，下令解散國民黨，撤消國民黨國會議員。凡自湖口起義之日起仍隸籍國民黨的議員，一律追繳國會證書證章，共達三百五十餘人。袁世凱撤消國民黨議員，同時就想達到國會無法集議的目的。但撤消三百五十餘人以後，兩院仍足法定人數，乃又補行追繳八十餘人，連跨黨的國民黨議員和『湖口起義』以前已經脫離國民黨的，都被撤消了，共計四百三十八人。十一月五日兩院開會，袁世凱仍不甘心，派軍警把守兩院門口，手持被撤消議員名單，逐一盤查到會議員。自此以後，國會不足法定人數，就再也無法開會了，時間距離他們選舉袁世凱爲正式總統還不到一個月。

這一道解散國民黨撤消國民黨議員的命令是由內閣總理熊希齡副署發布的。事後因影響國會不能開會，衆議院與參議院的政府黨議員這才知道所謂撤消國民黨議員是什麼意思，相繼於十一月十七日及十二月三日聯名分向國務院提出質問。衆議員說，他們對國民黨素深惡

絕，並會聲罪致討，現在「政府」撤消國民黨議員，使整個國會「不蒙解散之名而受解散之實」，簡直是玉石俱焚了。參議員說，「既以非法使國會永無開會之日，而又畏首畏尾，不欲居破壞國會之名，究竟奚所取義？是何居心？」國務院遲延到十二月廿三日才提出一個答覆書，說根據「約法」、「國會組織法」和「議會法」，議員質問應於全體議員過半數出席之開議時間提出，「對於不足法定人數之議員非法所提出之質問書，應不負法律上答覆之義務」。接着就有由黎元洪領頭的各省都督民政長聯名通電，請求給資遣散「不足法定人數」的國會殘餘議員。

袁世凱到這時，竟還不肯正面坦當解散國會的責任，又把各省都督的建議提請「政治會議」審議。所謂「政治會議」者，原係一種行政會議。初因十月間熊希齡梁啟超等擬向國會提一個大政方針，其中有個廢省改制的計劃。袁世凱想要各省出頭反對，便說茲事體大，應該召集一個中央與地方長官代表會議決定，意在乘機建立抵制國會的機關。在熊內閣欣然同意之下，十一月五日（解散國民黨撤消國民黨議員的第二天）發表了召集令。這時袁世凱就因利乘便把這個行政會議改名為政治會議，實際代國會而為御用的立法機關。這政治會議

於一九一四年一月十日開會，果然議決認爲黎元洪等建議合理，袁世凱卽於是日以熊內閣全體閣員副署，下令停止現有國會議員職務。距成立時間不過九個月的國會，至此正式結束。國會解散以後，熊內閣壽命也迫在眼前。熊希齡却仍繼續追隨在袁世凱後面向獨裁道路拼命奔馳，在廢省改制計劃大受出席政治會議的各省代表指斥之後，還副署了解散各省地方自治會和各省省議會議的命令，把所有辛亥革命以來建立的『共和國』機關斬盡滅絕了。原來袁世凱之設立這個『第一流人才內閣』，爲的就是要他來服這個務。該做的既都做了，他就沒有存在的餘地了。袁黨的冷嘲惡罵使熊希齡只得在二月十二日正式宣布辭職，梁啓超汪大燮等『第一流人才』也功德圓滿，悻然引去。

由地主階級中的士紳政客組成的進步黨，在熊希齡組閣這一幕戲中把他們的醜態表現到了極點。他們在滿清時代是君主立憲派，在辛亥革命中混入革命陣營而終於幫同袁世凱撲滅了國民黨，現在袁世凱想當皇帝，就連進步黨人所幻想的『政黨內閣』也覺得碍手碍腳了。但進步黨人並不死心。『第一流內閣』雖然垮了，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又提出『開明專制』的幌子來希圖重新博取袁世凱的寵信，跟在帝制運動後面搖旗吶喊。

第五章 怎樣上場，怎樣下場

當袁世凱站出來承繼滿清王朝並篡奪人民革命的果實的時候，他是封建勢力、買辦級和帝國主義的寵兒。帶着妥協性和軟弱性來領導革命的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本來在革命一開始就離開人民和各地方封建勢力妥協了，接着又懷着分嘗一片的幻想，迎頭向這個封建勢力的大頭目呈獻了整個的革命果實。於是袁世凱成了真正的中心人物。於是袁世凱的野心隨着事件的發展脹大起來：臨時總統，正式總統，終身總統，有皇帝權力的總統，乃至最後終於要做皇帝。

資產階級的國民黨人起初企圖拉住他，繼而跟他走，終於被他踢開。地主階級的立憲黨人擁護他『立憲』，擁護他集權，甚至擁護他實行『開明專制』。直到袁世凱的帝制陰謀暴露時，立憲黨人看出袁世凱並沒有成功的把握，反而可能激出他們所最害怕的革命，這時他們才舉起了反袁的旗幟，在反袁戰爭中爭取領導權。

袁世凱的權力無限制地擴張，野心越來越大。他的統治雖為大地主和買辦所擁護，但已經經歷過一次尚未成功的革命的人民大眾對他一點也不發生好感。向來扶持他的西方列強因捲入了歐戰而較少東顧之餘裕，狡詐的日本帝國主義乘機來搬弄袁世凱政權，企圖一手控制中國。帝制運動的公開化終於使袁世凱落到衆叛親離的局面中，結果不能不在四面楚歌之中結束其皇帝的幻夢。

一 有皇帝權力的總統

在各黨各派被袁世凱分化、收買、各個擊破或踢開的時候，獨裁政權「合法化」的步驟就著著進行了。

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袁世凱向他的御用機關政治會議諮詢：「應如何增修臨時約法」？袁世凱的意思是利用該會作為修改約法的工具。但這個御用機關自覺本身來歷與形式都不足以當此重任，經過「一再討論，兩度審查」，於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一月十日呈覆（袁制定政治會議對總統用「呈」）道：「宜於現在之諮詢機關（即政治會

議)及普通立法機關外，特設造法機關以改造民國國家之根本法。」袁世凱即據呈再諮詢：「此種造法機關之組織、名稱、職權、範圍及議員之選派方法」，於是政治會議議定這個造法機關的組織名曰「約法會議」。並於一月廿六日制定「約法會議組織條例」呈由袁世凱正式公布。照該項條例規定，約法會議議員選舉人的資格限於官吏、地主、資本家和上層知識份子，一般所謂公民都沒有選舉權。被選舉人資格更以列名政府所制定的候選人名冊者爲限，當選以後尚須經過政府所組織的審查會議審定合格，才能充當議員，說得明白些就是，這些議員是以對袁世凱一呼百諾爲當選條件的。

約法會議於二月十八日成立。一個曾經是國民黨員而現在緊抱住袁世凱腿子的無聊政客孫毓筠當選爲議長，另一個曾經由袁世凱派充監督制憲八委員之一的打手黨黨員施愚當選爲副議長，議員除浙江、廣東、雲南各另選一人外，共五十七人。

袁世凱於三月廿日將增修約法案咨交約法會議，其中要點計有七項：一、外交大權應歸諸總統，凡宣戰媾和及締結條約，無庸經參議院之同意；二、總統制定官制官規及任用國務員與大使公使，無庸經參議院之同意；三、採用總統制；四、正式憲法應國會以外之國民會

議制定，由總統公布，正式憲法之起草權亦應歸於總統及參議院；五、關於人民公權之褫奪回復，總統應自由行之；六、總統應有緊急命令權；七、總統應有財政緊急處分權。這樣一個可以爲暴君的『總統制』全部由約法會議接受，一一寫進了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五月一日由袁世凱公布的『中華民國約法』裏面。

實際上，這個約法會議的議員們在制定約法的時候，也是把總統當作皇帝的另一名稱來處理的，因而把美國國務院首長 *Secretary of State* 的日本譯名『國務卿』借用過來，牽強附會而又滿含暗示地寫在他們的約法裏面說：『行政以大總統爲首長，置國務卿一人贊襄之』。中國舊時所謂『卿』，本是『天子』的輔弼之臣，『卿』字出現在約法裏面，已先意承志隱喻總統爲『帝』。約法第六十五條又遵循袁世凱指示，規定優待清帝條件永遠不變更其效力，爲未來稱帝預伏一筆，以示帝位乃由滿清禪讓而來。四月十二日，約法尙未公布，大陸報駐北京記者即以『論中國政局之將來』爲題，對此點痛加揭發，並且說：『前星期外間有共和將改帝制之謠，然今所謂共和，徒存虛名，易其名則爲帝制矣！』

約法公布以後，在法律上，袁世凱的獨裁權力已經燦然大備。於是乃在總統名義之下，

進行皇帝排場的官制改革。廢止國務院，設政事堂於總統府。政事堂以國務卿爲首長，置左右兩丞。以徐世昌爲國務卿，楊士琦爲左丞，錢能訓爲右丞。國務卿的地位儼然當朝宰相，徐世昌且被善於逢迎的人稱呼爲『相國』。這位老相國上台以後，果然也就特別致力於恢復帝王時代的官階名稱，把朝中百官，分列九等，名目是：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各省民政長改稱巡按使，觀察使改稱道尹。各省都督府改稱將軍府，都督改稱將軍，有上將軍、將軍、左右將軍。沒有兵也沒有地盤在北京作寓公的軍人爲『威』字將軍，如蔡鍔爲昭威將軍；實授都督的爲『武』字將軍，如馮國璋爲宣武將軍，督蘇。皇帝的權力和排場都已經有了，後來的帝制運動其實只是個把總統改稱皇帝的正名運動了。

約法規定的新立法機關爲『立法院』。在立法院未成立以前，以參政院代行其職權，作爲總統的諮詢機關，政治會議至此廢止。事實上立法院始終沒有成立，它的職權始終是由參政院代行的。參政院於六月廿日成立，以黎元洪爲議長。參政共七十人，全由袁世凱委任，遴選以惟老惟舊爲標準。據說當時會特派大員多人携袁世凱親筆信分赴大連青島的遺老窟中

勸請他們出山，信中警句有云：『共和宣布係政體之更易，並非清室之已亡。望勿以此芥蒂於懷，同出匡濟，以救中國之危。』

這參政院迎合袁世凱意旨，於八月十八日建議修改總統選舉法。約法會議即根據這個建議，於十二月廿八日通過修正總統選舉法。規定：一、總統任期改爲十年，連任亦無限制；二、凡屆總統改選之年，參政院參政如果『認爲政治上有必要時』，得爲現任總統連任之決議，即無須改選；三、總統繼任人應由現任總統推薦於選舉會，其名額以三人爲限，被推薦人姓名由現任總統預先書於嘉禾金簡，藏之金匱石室，臨選時始行取出，交付選舉會。其鑰匙三柄，由總統、參政院長、國務卿分別掌管，不得擅開。被推薦者並無限制，傳賢傳子悉由現任總統決定。從此袁世凱的終身獨裁元首，甚至世襲獨裁元首都已經確定了。

在這些走向稱帝的步驟中，進步黨人可說是無役不從的。政治會議有蔡鍔參加，參政院的副議長是汪大燮，秘書長是林長民；被委任爲參政的，有梁啓超、熊希齡、汪榮寶等。張謇、熊希齡、汪大燮會接受袁世凱封爵爲中卿，湯化龍少卿加中卿銜，梁啓超爲少卿。他們被袁世凱從國務院和國會趕出來以後，這時又已經從新在崇拜着袁世凱的作爲大獨裁者的權

力，想像由他來實行什麼『開明專制』了！

和進步黨人的想像相反，另有一批滿清的孤臣孽子，看見袁世凱雖然做着民國總統，却念念不忘封建舊制，郊天祀孔，大事復古，外間又流行着種種『共和不適用於國情』的論調，就神經過敏地加以揣摩，以為總統志在還政清室。於是這一批人之中有個勞乃宣，就在一九一四年六月首先刊布一種題名『正續共和解』的小冊子，謬引周召共和故事，解釋共和乃君主政體而非民主政體，並謂：『今之總統於皇室初不甚尊崇，繼乃異常擁戴，有伊尹之志云云。』同時又連續上書清史館館長趙爾巽、徐世昌和周馥，主張『以歐美總統之名，行周召共和之事』，預定十年為還政之期。袁世凱看了這幾封信也不表示意見，但說：『很好，叫他來做參政吧。』遺老們聽了這個消息，居然大為起勁，以為袁世凱果真有意『還政』了。劉廷琛的『復禮制館書』和宋育仁的還政清室演說發表以後，復辟之說盛極一時，把一班老頭子攪得昏頭昏腦，甚至有個在清朝做過學部大臣的唐景崇，臨死的時候還請求清室賜諡。可是到了十一月初，就有袁世凱爪牙肅政史夏壽康與參政孫毓筠先後請求嚴禁復辟謬說，袁世凱與內務部隨即據呈通令查禁，並將宋育仁優禮解送四川原籍，又因宋育仁案牽涉到孔道

會，捕去該會幾個老頭子，一班皓首匹夫蒼髯老賊看見形勢不對，嚇得人人自危，只好夾着尾巴四散奔逃，消聲匿跡。

復辟空氣被打散以後，袁世凱自行稱帝的真意完全顯露，帝制運動就一步緊一步正式上台了。

二 黑龍會陰謀

袁世凱的帝制計劃雖然在著著進行之中，但是實現這個計劃的外在條件却在這時發生了極其不利的重大變化。

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八月一日歐戰爆發，西半球國家先後被捲入了戰爭。一個依靠帝國主義扶植起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權，其變動是不能脫離帝國主義的影響的。帝國主義對袁世凱政權的要求是維持既得利益的現狀，特別在戰爭爆發以後，各國無暇東顧，任何變動都足以引起帝國主義的憂慮。假如沒有歐洲戰爭，幾個主要強國有餘力監視他並協助其壓平內部反抗，帝國主義是不反對袁世凱稱帝，實行所謂君主立憲的。

在帝國主義的了解中，袁世凱是一個「強者」(Strong man)。在稱帝以前，袁世凱所進行的一切排除異己，集中權力的步驟，都曾經從外國公使和顧問直接得到鼓勵。甚至在袁世凱稱帝的幾個月以前，英國公使朱爾典在一次密談中，還對袁世凱說：『共和政體，華人未嘗研究；君主政體或稍知之。當辛亥革命之日，華人醉心共和，以此口號推翻滿清。是時大總統以爲君主立憲近於中國人民理想，我與美使嘉樂恒亦曾主張君主立憲，即前駐京美使柔克義亦屢言之。南北討論之時，唐紹儀因一時之感動，未察國家萬年之計，主持共和，不可謂非失策矣。』

這是很明白的，帝國主義需要袁世凱建立中國的殖民地秩序，其形式爲有皇帝權力的總統也好，爲皇帝也好，所反對的就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可是歐洲爆發以後，隨着中國內部情勢之變化，帝國主義贊成帝制就有了附加的條件：不能有「內亂」。帝國主義很怕袁世凱因爲急於要做皇帝遭受中國人民和各種反對勢力的攻擊，以致加速其崩潰。可是這種意見在袁世凱登上皇帝寶座以前，表示得也並不明白。大體上贊成，僅僅有一點反對，袁世凱當然還是決心做皇帝。這時候袁世凱還有一點沒有估計得够的，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陰謀。

歐戰吸住了全世界帝國主義的力量。日本認爲侵略中國的大好時機已至，德國對俄法宣戰（八月一日）以後兩個禮拜，日本即對德國提出最後通牒，要求德國退出太平洋全部根據地，並限於八月十五日以前將膠州租借地讓與日本。八月廿三日，日本對德宣戰，立即派出海軍封鎖膠州灣。在這些事件發生以後，日本秘密組織「黑龍會」就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一個包括侵略中國全部計劃的備忘錄。這個備忘錄於一九一五年日本強迫袁世凱訂立廿一條以後幾個月被揭露出來。在這個備忘錄中，黑龍會認爲德國戰敗以後，列強分割了歐洲，一定回過頭來分割中國，如果日本此時僅僅致力攻取膠州，忽略戰爭的重大後果，終於一無所得。「目前乃爲日本迅速解決中國問題的最好的時刻。這樣的機會是千載難逢的。不但日本的神聖任務要在此際執行，而且中國現勢亦適於實現這樣一個計劃。我們必須當機立斷並見諸實行。」

這個計劃就是迫使中國處於一種完全就範的地位，按照該備忘錄所舉秘密條款建立中日軍事同盟。這些秘密條款包括了日本政府後來在一九一五年所提廿一條要求的主要內容。該備忘錄認爲袁世凱政府不能作爲建立此項軍事同盟的對手。不但不主張支持袁世凱，而且主

張傾覆袁世凱政權。

該備忘錄說：『考慮到軍事同盟在中國政府方面的效果，日本必須估計中國現在統治者袁世凱地位穩固否，現政府政策獲得多數人民信用否，袁世凱將同意日本政府所提軍事同盟之建議否。這幾點都是我們必須予以充分考慮的。按之袁世凱向來所採態度，我們知道他對外交涉常常使用因利乘便的手段，表面上對我們友好，實際上依恃列強力量以反對我們並拒絕我們的要求。』又說：『袁氏可能有一時期對日友好，一旦歐戰結束，袁氏勢必拋棄日本而復與他國親善。由袁氏歷史可斷言其將來將如何作爲。……因此，日本政府應考慮協助中國人民，誘使中國革命黨人、保皇黨人及其他失意份子在中國各地擾亂，其全國既亂則袁政府必隨之而倒。我們即可在中國四萬萬中選擇一個最有勢力最有聲望的人，協助其組織新政府，統一全國。同時我國陸軍應協助該國恢復和平與秩序，保護人民生命財產，於是則人民將傾心歸順，當然信賴日本的新政府。……中國政府保持共和形式將爲中日軍事同盟前途一大障礙。爲什麼？因爲共和國政府的基本原則與人民的社會道德目的，顯然不同於君主立憲國家，它的法律與行政也是互相抵觸的。……因此，爲了改建中國政府，建立中日同盟，

確保遠東和平及實現日本帝國政策之成效，我們必須利用目前機會，將中國共和政府形式改變為與日本完全相同的君主立憲。此實為確實改建中國政府所必須堅持的極則。假如中國政府改共和政體為君主立憲政體，在新的統治者的選擇上，我們將請宣統復位，在皇族中擇一最有才能之人，抑在革命黨人中選擇最值得扶助之人？我們以為目前最好保留這個問題，待將來緊急之時，事件已經發生，再作決定。」

很顯然，黑龍會這個計劃，是以推翻袁世凱，另建一個便於接受日本侵略的政權為前提的。但是日本帝國主義對於當前時機的愛好超越了他們對袁世凱的猜忌，儘管他們一面扶植中國的反袁勢力，甚至進行分化袁系的馮國璋、段祺瑞、張勳等；一面因為袁世凱野心勃勃想做皇帝，禁不住又想試以袁世凱為敵詐的對手。一九一四年九月二日日軍在山東半島登陸，至十一月七日佔領青島，已將德國在山東的地位完全取而代之。兩個月以後，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駐北京公使日置益於言見袁世凱的時候，即直接向袁提出著名的二十一條要求，並且恫嚇袁世凱說，『中國國民黨與日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關係（指黑龍會首領顏山滿），除非中國政府給以友誼證明，日本政府直不能阻止此輩之擾亂中國。』

這廿一條要求經過二月至四月的長期談判，終於五月七日由日使日置益以最後通牒迫使袁世凱於五月九日完全承認。在廿一條談判進入最後階段之際，那些在中國獲有重大利益可是只能集中力量於歐洲戰爭的帝國主義國家，看到日本之全面控制中國僅爲時間問題，莫不大爲憂慮起來。於是乃有美帝國主義於五月十三日向中日兩國致送覺書，申明中日兩國間任何協定與契約不得損害美國的條約權利，中國的政治及領土的完整，以及門戶開放主義。而袁世凱於備受國人怨毒之餘，至此更陷孤立。反袁運動即於反日的怒濤中逐漸抬頭，日本帝國主義見到袁世凱地位動搖，廿一條要求將不可能因袁世凱之承認而實現，也就跟着走上倒袁的途徑了。既然反袁運動不可免地會發生，那就要努力使反袁運動走向於日本帝國主義有利的方面，這正是狡猾的日本帝國主義在那時的打算。——這種打算在黑龍會文件中是已經預擬出來了的。

三 帝制運動

可是在整個竊國稱帝過程中，袁世凱始終是勇氣大於智慧的。英國駐北京公使朱爾典對

袁世凱陳述關於君主立憲的意見時說：『若國中無內亂，則隨時可以實行。此係中國內政。他人不能干涉。』袁世凱回答說：『內亂不能決其無，但不致擴大，余可担保治安之責。』袁世凱根據他的經驗認定，要在中國搞革命，必須有錢，僅僅有政治理想是不行的。革命黨人沒有外國支持，就不會有力量。而一班有實力的人，只要送給他們足夠的錢，就會把他們的烏合之眾的軍隊交給你，聽你指揮。

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一月十八日，日本提出廿一條以後，顯然已經給袁的稱帝計劃一個致命的打擊，可是袁和袁的黨羽却把它看作有利條件，以為西方列強無暇東顧，單獨日本一國，予以少許權利綏靖一下便可換來日本的支持。在袁世凱與朱爾典談話中，也僅僅表示：『至東三省及蒙古，實難預料。該處日人甚多，倘有日人被殺，不論華人為首犯日人為首犯，日人即可乘此造出機會，此不能不慮者也。』始終沒有預料到日本人的倒袁計劃還不是一種公開直接的行動，而是從扶植國內反袁勢力着手。因此帝制運動還是堅決進行，一步一步表面化起來。

爲了從人民心理上抹去中日不平等條約的恥辱，造成帝制空氣，袁世凱的僕從們故意把

廿一條的簽訂頌揚爲「元首外交成功」。御用報紙著論認爲「雙方交讓，東亞幸福」，各省賀電紛傳，甚有主張開慶祝會，舉行提燈遊行的。到這年六月，袁系人物已經躍躍欲動了。可是就在這時，袁系的帝制人物也逐漸形成了兩派。

一派是走袁克定路線的太子派，而造成這一派的主要人物則爲楊度。楊度是個專走上層路線，常常想擇聖主明君而事之的政客，醉心作大官，却從來沒有作到。虧他久居袁世凱幕後，費了許多揣摩工夫，算是窺破了袁世凱帝制自爲的心思，遂與夢想繼承皇統的袁克定聯成一氣，願爲前驅，以便取得「新朝宰輔」的位置。然而這一派事實上只是作了帝制運動的宣傳員，始終沒有排除袁朝舊官僚系統，達到掌握新朝權力的目的。有了這一派想作新朝元勳的人，就使得舊官僚系統結成了另一派，是爲官僚派。官僚派以朱啓鈴、周自齊爲首。他們是現任官吏。袁世凱做總統，他們要做官；袁世凱做皇帝，他們還是要做官。前一派人鼓吹帝制，他們就實行帝制，連進行帝制的權力也一手奪過來。

在這兩派以外的北洋系軍人，大部份都在各省有了地盤。爲了他們在各省的地盤，他們的擁護袁世凱是沒有問題的。但當袁世凱地位動搖的時候，他們這些既得利益集團就仍以維

護本身利益爲第一義。其中真正被袁世凱看作心腹的僅湖北將軍段芝貴，安徽將軍倪嗣冲，四川將軍陳宦，湖南將軍湯漪銜等寥寥可數的幾個人。北洋系的兩個大頭目，段祺瑞和馮國璋，因爲位尊權重，在袁世凱正式「登基」的時候，反而受到了袁世凱的猜忌。一九一四年十月袁世凱接受袁克定建議，以「模範團」名義開始編新軍，並特設「新建陸軍編練處」，大小事務一概親自處理，隱然有以新軍代替北洋軍的企圖，早把陸軍總長段祺瑞冷落了。馮國璋外放江蘇將軍以後，對段祺瑞在中央的地位早懷嫉視，曾經竭力推動編練新軍的設施，藉以打擊段祺瑞。到一九一五年七月袁世凱對馮國璋絕口否認稱帝，而馮回南京即聽到帝制運動公開進行的消息，也和段祺瑞一樣，感到袁世凱並不對他推心置腹看作「自己人」了。原來這兩個北洋系大頭目都有繼任總統的野心，沒想到他們做總統夢，袁世凱却做皇帝夢，並因此產生了削弱他們的企圖，他們的離心離德是可想而知的。

一九一五年三月楊度發表他的帝制論文『君憲救國論』，袁世凱特賜題『曠代逸才』的褒語。可是有了這位『曠代逸才』的論文尙嫌不足以動人，袁世凱又買通他的憲法顧問，曾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的美國政治流氓古德諾博士（F. J. Goodnow）在八月間發表了一篇『共

和與君主論』。古德諾的論文和楊度的論文有什麼不同呢？他們之認爲中國人民知識程度低落，不能參與政治是相同的；認爲由專制一變而爲共和，太驟，是相同的；認爲中國實行君主制較共和制爲宜，也是相同的。僅有的差別就在於古德諾是美國人而楊度是中國人。特別因爲美國是個所謂共和國，連共和國的『學者』也說中國應該由一個皇帝來統治，這就振振有詞，彷彿理由很充分了。於是就在古德諾論文發表以後一個星期裏面，以楊度爲首的『六君子』便以『古德諾也這樣說』爲根據，宣稱將『籌一國之治安』，發起籌安會，冒稱學術團體，公開進行帝制運動了。

與楊度聯名發起籌安會的『六君子』，嚴復與楊度同爲清末立憲黨人；孫毓筠、胡瑛、李燮和是叛變的同盟會和國民黨人；劉師培是同盟會黨人而早向滿清告密的叛徒，和嚴復、胡瑛都是有名的鴉片鬼。其中與楊度同爲籌安會中心人物的是孫毓筠，其餘都是由楊孫二人拉攏來的配角。這個光怪陸離的組織連公開的成立大會都沒有開成，偷偷地議定了簡章，並照章推定楊度爲理事長，孫毓筠爲副理事長，嚴、劉、李、胡爲理事。同日發出通告說：『本會宗旨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國體二者以何適於中國，專以學理之是非與事實之利害爲討論之

範圍……至此範圍以外各事，本會概不涉及。』一面又電請各省軍政長官派代表晉京討論團體問題，預定討論好了，就超出討論範圍，以各省名義向參政院請願實行帝制。

籌安會成立以前，袁世凱從來不正面表示稱帝的真意。如果有人正面問他，他一定立即否認。因此一斑不識袁世凱真意所在的人，見到籌安會這個不倫不類的團體，就紛紛提出詢問。可是袁世凱這時候漸漸改變了他的腔調。八月十七日申報北京電云：

有人謁袁總統，問：『應否干滲籌安會？』袁答：『近數年來，此項言論，耳聞已熟，久不措意。自因歐戰及墨西哥屢次政變。遂激觸中外注意新造民國之利害。予所居地位，祇知民主政體之組織，不應別有主張。且帝王總統均非所願戀。無論研究者作何主張，於余個人固嫌疑可慮。余及國人均有身家產業子孫親族，人情切已，自當研究所以永保安全之法。予既受國民付託，何敢以非所願非所戀二者之嫌疑而強加干涉？』又另一方面人云：袁意謂此日如不任命學者輿論自由研究此項問題，則有一部份人主張頗力，搖撼國體，不如以此緩和其空氣。

各省電詢政府對籌安會之態度，則答以『該會為績學之士所以研究國體者，苟不擾亂治安，政府未便干涉。』肅政廳以肅政使全體名義呈請取消籌安會，袁但批『着內務部確切查，明定範圍，示以限制』。以後有向肅政廳、內務部或檢察廳告發，請求查禁或提起公訴的都毫無下文。有一班自命為帝制反對派的人，因為從袁世凱嘴裏聽到有『研究自由』這個

名詞，就進行組織團體與籌安會對立，然而不是官廳不予立案，就是受到其他牽制，終於無法成立。籌安會所和楊度、孫毓筠私宅却有武裝軍警守護。使得從前不了解袁世凱真意或不肯相信袁世凱要做皇帝的人，現在都明白了。對袁世凱存着幻想的人，至此幻想完全破滅，而素以擁袁為職志的各省官吏看準帝制的風色轉舵，也不再詢問政府對籌安會的態度，紛紛派代表晉京了。

可是各省代表的行程趕不上籌安會要求的急切。籌安會最初準備討論以後，再行請願，後來又取消討論，改爲投票決定『君憲』或『共和』，現在連票決也來不及了。參政院九月一日就要開會，籌安會爲了要趕得及向參政院投遞請願書，只好不待各省代表到齊，便以各省旅京人士的名義分別組成各省公民請願團，所有請願書一概由籌安會代爲起草，到九月一日便如雪片一般飛進了參政院。

四 醜劇登場

正當籌安會把帝制運動推向高潮的時候，一班袁系官僚如朱啓鈴、周自齊、張鎮芳、袁

乃寬等，看見這場戲愈演愈真起來，爲了爭取新朝地位，也紛紛起而參加。當時正因所謂『五路大參案』避居西山的梁士詒也被拉了出來，他就乘機組織『全國請願聯合會』，以緩和『五路大參案』的風潮。這個全國請願聯合會既出，即趕前一步，取籌安會而代之，成爲帝制急進派和實際行動的領導者。帝制程序進行之迅速，竟使籌安會成立不到一個月就失去了它的地位，後來即因此不能不改稱爲『憲政協進會』而結束。辛辛苦苦地作着帝制丑角的楊度最後得到的也不是他所願望的『新朝宰輔』，而是從滿清憲政編查館接收來的一批立憲檔案和參考書，還有一個並未發表的封爵『文憲公』，就下場了。

參政院審查他們收到的變更國體請願書，全國請願聯合會即根據袁世凱『徵求國民之公意』的意向向參政院請願，請以國民會議爲解決國體機關，參政院遂於一九一五年九月廿日（民國四年）議決『請政府於本年十一月廿一日召集國民會議，爲根本上之解決，或另籌徵求民意之妥善辦法』。可是請願聯合會又以國民會議開會遲緩，且屬決定憲法機關，因而再次發動向參政院請願，謂『非迅速特立正大之機關，徵求真確之民意，不足以定大計而立國本』。於是參政院即根據請願者的要求，於十月二日制定『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以國民

會議初選人爲基礎，選出國民代表，決定國體。十月八日袁世凱正式公布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所謂國體投票便在一個統一的指揮下，以驚人的速度在全國各省完成了。

十月廿五日開始選舉，十月廿八日以後便繼續國體投票，不到一個月全國各省報告決定君憲的已有十八處。在原定十一月二十日以前，全國各區國體投票全部告竣，十二月十一日參政院彙查全國國民代表共計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得主張君憲票一千九百九十三張。各省區並以寫着同樣文字的推戴書一致委託參政院爲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恭戴今大總統袁世凱爲中華帝國皇帝』。參政院即於查票與彙集推戴書同日（十二月十一日）上書勸進。袁世凱於同日退回推戴書，表示謙辭，說：

追懷故君，已多慚疚，今若驟躋大位，於心何安？此於道德不能無慚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國初建，本大總統曾向參議院宣誓：願竭能力，發揚共和，今若帝制自爲，則是背棄誓詞，此於信義無可自解者也。……尙望國民代表大會總代表等熟籌審慮，另行推戴，以固國基。

參政院於同日下午五時集會討論袁世凱覆文，表決二次勸進，由秘書當場起草二次勸進表，五時十五分即已稿成（其實一切都是事先準備好了），文長二千餘字，把袁世凱關於道德信義的種種顧慮完全洗刷干淨，即晚進呈。次日（十二日）袁世凱申令接受帝位。十三日

即在居仁堂『受百官朝賀』。可是袁世凱攀上帝座的時候，也就是他開始崩潰的時候，一切由集權賣國所種下的因素都迅速向相反的方向發展了。

這裏又要說到日本帝國主義當時的做法。——據當時駐北京美國公使芮恩施（Dr. Paul S. Reinsch）說，原來和袁世凱簽訂廿一條不平等條約企圖從袁手裏奪取中國權利的日本帝國主義，在十月下旬已經從袁世凱的帝制運動中作出結論，認定扶助袁世凱稱帝的計劃必須儘可能使之停止了。十月廿八日下午，日本駐北京公使會同英、俄兩使向袁世凱提出警告說：『中國組織帝制，雖外觀似全國無大反對，然根據日政府所得報告，並詳察中國之現狀，覺此種外觀僅屬皮毛，而非實際。』要求『顧念大局，而行此展緩改變國體之良計』。十二月十三日，正是袁世凱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賀之日，日使又聯合英、俄、法、意四國公使提出警告，申明『以後對於中國決定執行監視之態度』。實際上，當時日本顯然已經看出袁世凱不能作為奪取中國主權的可靠的代理人，暗中早已進行資助宗社黨人，國民黨人和進步黨人等各種反袁世凱勢力潛入全國各地準備起事。

袁世凱對於日本的警告雖然回說『意外之亂軍或猝起，中政府自信無論何時均有完全對

付之力』，但也是滿懷着不祥的預感的。十二月十三日，剛剛在居仁堂受過百官的朝賀，就遵令禁止反對派活動。

好亂之徒，謀少數黨派之私權，背全體國民之公意，或造言煽惑，或勾結爲奸，甚爲同國之公敵，同種之莠民。在國爲逆賊，在家爲敗子，蠶國禍家，衆所共棄，國紀具在，勢難姑容。予惟有執法以繩，免害善良！着各文武官吏剴切曉諭，嚴密訪查，毋稍疏忽！

袁世凱是民國以來第一個迷信武力的大獨裁者，他看得見的是一個一個被他打敗了削弱的敵人，却看不見全國人心所向，也看不見日本人的陰謀，他的愚蠢的自信力使他簡單地認爲那些『逆賊』『敗子』的反抗可以用武力平服下去。不管怎樣，他已經坐上『龍庭』，沒有猛烈的打擊，他是不肯下來的。設立大典籌備處，和從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起改元『洪憲』，封官賜爵，預備登極的命令一個連接一個發表出來。可是正當這個時候，接近進步黨的軍事首領蔡鈞潛離北京，在日本人協助下回到了雲南，十二月廿五日與雲南將軍唐繼堯、巡按使任可澄等發出通電，宣布雲南獨立。在洪憲王朝登場的前一個星期，就點起了反抗的火把。

五 反袁統一戰線

人民是反對袁世凱政權的。當時有個在杭州大學教書的英國人惠勒（W. R. Wheeler），據說，他曾經廣泛地接觸過華中華南中下層社會的人，其中包括有人力車夫、讀書人，和尙以及留學生，他們『在謹慎地避免了偷聽之後，每一個人都表示擁護共和，指斥袁世凱。』惠勒還指證摩理遜博士旅行了華中回來，也說人民對袁世凱一致憤恨。人民憤恨袁世凱是有來由的。當時甲寅雜誌所載一篇私人通信說：

州縣之官，十九爲前清聲名狼藉之污吏。而報館不敢據事直書，地方公正士紳懼言及公事，彼可誣爲亂黨以掛其口，則不能不探明暫保身之義，以故生殺予奪，惟所欲爲。吏治之壞……卽頑固黨亦驚爲前清所未有，而存時日曷喪之想。

作者說，他回到他家鄉不過十天，就見有十多個十一二歲小學生因談武昌革命故事犯革命黨嫌疑被警察抓去，警察則藉此勒索贖金。這種恐怖統治更助長貪污，也更加深了人民對袁世凱政權的厭惡。可是在當時，從中國下面人民大眾中也還沒有能自行生長出革命的領導

力量來，因此反袁運動的領導權，仍舊是被善於投機應變的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的政黨所攫取了。

國民黨由於與袁世凱實行澈底妥協的結果，早被袁世凱打得七零八落。孫中山和少數幹部逃到日本以後，於一九一四年六月在東京成立了中華革命黨，決心繼續倒袁，重新建立政權。但是中華革命黨只是一個非常狹隘的秘密組織。與同盟會相反，中華革命黨不僅完全放棄與黨外人士合作，而且具有強烈的排他性，即在黨員之中亦有『首義黨員』『協助黨員』與『普通黨員』之別。在革命時期內，首義黨員爲元勳公民，得一切參政執政之優先權利，協助黨員爲有功公民，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普通黨員爲先進公民，僅得享有選舉權。實則他們的力量既極微弱，在人民中又已失去辛亥革命時代所擁有的聲望，而他們進行倒袁的方式却仍舊以軍事冒險爲主。因此一九一四年六月至十月在蘇浙各地的起義，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在上海的肇和軍艦起義，都連續失敗了。同時派往山東、陝西、四川、雲南、廣東、江西各省活動的黨員也僅以聯絡軍隊爲能事，而沒有深入民間，組織人民的反袁力量。雲南起義以後，這一派『反袁急先鋒』倒成了配角。孫中山的政治見解較當時反袁各派深刻，但缺乏

遠見的策略和實際貫徹其主張的力量，無從領導起全面的反袁鬥爭和決定去袁以後的局面。

國民黨的一部份右派份子如李根源、鈕永建、陳嘉明、章士釗等這時站在中華革命黨外面，成爲與進步黨極接近的一派。在日本提出廿一條的時候，這一派還發表過一個主張停止革命行動一致對外的通電，以便袁世凱能集中力量對外。直到帝制運動完全公開進行以後，他們才以『歐事研究會』名義向國內活動，與國民黨國會派和進步黨聯合，參加反袁戰綫。

在反袁運動中力爭領導的進步黨，本來只是一班侍候北洋閥軍的政客。當帝制運動公開以前幾個月袁世凱實行無限制集權的時候，他們尙在想望着開明專制的好時代。待籌安會出現了，梁啓超才發表他的論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表示了他們的態度。他們是主張『在現行國體基礎之上而謀政體政象之進步』，反對變更國體現狀的。換言之，以共和之名，行專制之實，他們並不反對。而且『亦私謂中國能復返於帝制，庶易圖存而致強』，但認爲尙須『稍假歲月』，否則便是『全國鼎沸，羣雄割據』之局。梁啓超預見袁不能接受他的忠告，這個局面就一定出現。在他寫給籍忠寅等的一封信裏面，梁啓超寫出了立憲黨人從清末以來的長遠的悲哀。

第一，吾黨夙昔持論，厭畏破壞，常欲維持現狀，以圖休養。今四年以來試驗之結果，此現狀多維持一日則元氣多斲喪一分。吾輩擲此聰明才力，助人養蠶，於心何安？於義何取？使長此無破壞猶可言也，此人（指袁）則既毫矣，路易十五所謂朕死後洪水其來，鼎沸之局既無可逃，所爭者早暮已耳。第二，吾儕自命穩健派者，失敗之跡歷歷可指也。曾無尺寸根據之地，惟張空拳以替人吶喊，故無往而不爲人所劫持，無時而不爲人所利用。今根基未覆盡者，祇餘此區區片土（指雲南貴州），而人方日甚詞其旁（指國民黨），當此普天同憤之時，我若不自樹立，恐將有煽而用之，假以張義聲者（指國民黨）。我爲牛後，何以自存？幸免於此，爲獨夫戮力，杯酒釋兵之事，數月後行且立見，儼然爲一匹夫以坐待割割，噬臍何及！

這就是說，現在袁世凱一定是站不穩的了，但與其讓別人來革命不如讓我們這班穩健派也來革一下命，把倒袁以後的局面控制在我們自己手裏。因此，梁啟超和進步黨的保護者蔡鐸一反其過去的主張，轉而倒袁。中華革命黨在當時儘管並不是一個有廣大人民力量作後盾的強大的政黨，從進步黨人看來，却是過激的。他們不願意在袁世凱倒後出現一個孫中山政權，使他們再爲『牛後』。爲了拒絕孫中山政權，他們就決定捨前一步發動倒袁，取得倒袁的領導權。他們的倒袁和孫中山的倒袁是不同的。孫中山宣言『不徒以去袁爲畢事』，梁啟超一派的進步黨人則只求去袁，並且只求在倒袁運動中不爲『牛後』，在去袁以後能自『樹

立」，便可滿足。所以在這一時期，國民黨急進派的中華革命黨，國民黨右派的歐事研究會和國會派，進步黨人和進步黨人影響下的西南軍人，雖然以倒袁爲目標形成了統一戰線，其中領導這個倒袁戰線的是進步黨人，倚爲倒袁主要力量的不是廣大人民羣衆，而是進步黨人影響下的西南地方軍人勢力。

雖然辛亥革命是失敗了的，但是辛亥革命中廣大人民反對專制帝制的意志是得到了第一次的表現，自此以後，要把人民的意志再拉往後退是不可能的了。這是袁世凱註定要失敗的原因。但當時缺少一個進步的堅強的革命政黨來把人民的真正意志集中起來，領導起來，於是一到袁世凱因其倒行逆施而搖搖欲墜時，日本帝國主義擁護進手來了，反革命的立憲派人也插進手來了，許多大小軍閥，甚至袁世凱所信託的部屬也紛紛打起主意來了——他們的共同目的都是要犧牲掉袁世凱而保持袁世凱所代表的整個統治勢力。在這情形下，倒袁的革命意義業已沖淡，而去袁以後的局面也已決定了。

六 袁世凱之死

雲南起義是經過蔡系滇軍中下級幹部長期醞釀，於蔡鈔回到雲南以後才決定的。對於唐繼堯，這是一種勉強相從的行動。蔡鈔答應保持唐繼堯雲南都督的位置，獲得與唐繼堯的妥協，穩定了雲南的地方局面。然後又與戴戡及堅決反袁的國民黨人李烈鈞分任護國軍軍長，率師北伐。蔡軍攻四川，戴軍經貴州攻湘西，李軍經滇南攻廣東。蔡鈔原有一個取四川爲根據地的計劃，但是所部兵力不過三千餘人，糧餉僅能維持兩個月，與袁世凱的戡亂軍苦戰於川南瀘、叙一帶，唐繼堯坐視不予補充，進展極其困難。

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一月廿四日，護國軍出師一月，戴戡部隊進入貴州，劉顯世才宣告貴州獨立。戴部繼續向川湘邊境攻擊，進展亦極有限，在貴州獨立以後又二個多月，陸榮廷與陳炳焜等才起而響應，宣布廣西獨立，並邀梁啟超入桂，準備組織政府。廣東的獨立則曲折更多。四月六日龍濟光宣布廣東獨立，是龍濟光感受到廣西獨立影響和內部壓力的結果，並且是事先得到袁世凱『獨立擁護中央』的指示才決定的。人人皆知其爲假獨立，廣東人因久受龍濟光壓迫，尤其不予信任，一致主張驅逐龍濟光，却因爲陸榮廷不肯與龍濟光破裂，梁啟超又是個穩健派，甚至到龍部在海珠會議上殺死陸榮廷代表梁派的湯覺頓和譚典虞

等以後，仍不放棄與龍濟光妥協，以取得龍濟光出師北伐的聲勢，因而內部爭端始終存在，無從建立一個堅定有力、真正適應當時客觀要求的反袁陣營。

儘管西南反袁勢力並不够強大，袁世凱的寶座也仍舊禁受不起這個力量的搖撼。他的獨裁主義和權謀已經到了盡頭：衆叛親離，成了真正名實相符的『孤家』『寡人』。在北京，袁世凱的心腹老友徐世昌得了個『嵩山四友』之一的尊號，早已被迫退休，不容不對他抱消極態度了。北洋系老幹部段祺瑞也因為備受袁世凱疑忌，不能不站在帝制的圈子外面，既然站在外面，自然也改變了對袁的忠誠，成爲坐觀風色的人。另一個北洋系老幹部馮國璋，早在雲南起義以前，就已經有國民黨右派份子與進步黨人和他暗中來往，甚至把他所統治的江蘇預計爲響應獨立的省份了。最後圍繞在袁世凱身邊的就只剩一羣帝制運動的健將和幾個魯莽的軍人，如倪嗣冲、段芝貴一流人。其他在各省任督撫的北洋軍人，他們都是袁世凱以身作則教養出來的機會主義者和地盤主義者，他們現在即使還是忠心的，也只能在自己地盤內辦到抵禦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反袁運動的襲擊了。

雲南宣布獨立的通電到達北京的時候，帝制運動正在高潮。袁世凱第一個對策就是下令

『戡亂』。第二個對策就是派遣周自齊爲赴日特使，以贈送勳章爲名，陰謀出賣更多的主權以乞取日本帝國主義的援助。到一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拒絕這個特使，這才使得一二敏感的策士感覺大事不好，主張撤消帝制。然而做皇帝不是一個人的事，還有許多人要依附他享受富貴榮華，縱使袁世凱果欲當機立斷，接受這個主張，那一班要富貴榮華的人也不會答應，他們決心一邊『戡亂』，一邊延緩登極。貴州獨立以後，川湘兩地形勢益見緊張，撤消帝制之說又起，不過皇帝是『民選』的，現在要取消，形式上也還得有民意機關表示，才能自圓其說。於是下令五月一日召集立法院，同時下令三月一日起撤消大典籌備處，準備『戡亂』兩個月再看形勢來作決定。

到三月中旬，廣西宣佈獨立，事件日益擴大，軍費日益困難，想向美國借款，但是美國雖然願意挽救他，却又怕吃倒賬，況且其中還有日本極力反對，終於絕望。這時候馮國璋、李純、張勳、靳雲鵬、朱瑞等又密電袁世凱，勸請取消帝制。袁世凱這才知道內外都已失去憑依，決定立即取消帝制，與西南進行妥協。最初朱啓鈴、梁士詒等尙提出反對，待他們了解了全部危機以後，也只好不響了。於是不等五月一日召集立法院開會，就在三月廿二日以

大總統名義將承認帝位案撤消了。同日宣布起用徐世昌爲國務卿，次日又宣佈起用段祺瑞爲參謀總長，並通令取消洪憲年號，仍以本年爲中華民國五年。從承認帝位以至撤消，爲時不過八十三天。

可是袁世凱的春夢還是沒有醒來：他不做皇帝，仍做總統。撤消帝制以後，即用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名義，致電獨立各省說：『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達；務望先戢干戈，共圖善後！』四月一日以後雙方停戰議和，袁世凱提出議和條件六項，集中於要求滇黔桂三省取消獨立解散軍隊，護國軍方面則堅持袁世凱退位。當時袁世凱所恃者爲長江流域各省將軍，以爲他們雖主張取消帝制，當不致反對他做總統。却不知道這時候這些投機的將軍們都已經不比從前了。如四川的陳宦早已經在與蔡鍔信使往還，竭力交好；湖南的湯薌銘亦通電主和不主戰；江蘇的馮國璋更認爲『南軍領袖希望甚高，僅取消帝制恐未足鑿其望。應另求保障將來之充分方法，即從根本上解決此問題。』袁世凱的親信和北洋系夙將都想效法一九一一年的袁世凱，取得一種左右逢源的中間地位。在北京則段祺瑞遲遲不肯就參謀總長之職，並且提出和平解決南事，暫緩擴充模範軍，恢復參謀部職權三項要求。

到四月六日廣東獨立，四月十二日浙江獨立，四月十八日護國軍軍政府又宣佈前大總統袁世凱因犯謀叛大罪，所有大總統資格當然消滅，依法由副總統黎元洪繼任總統。袁見事態日益擴大，已知難於收拾，只得於四月廿二日准徐世昌辭職，改任段祺瑞爲國務卿，意在以調停任務資段，同時宣佈恢復責任內閣制，藉以對南方表示讓步。可是五月八日護國軍軍政府却宣布黎總統身陷賊圍，不能執行職務，國務院亦無從產生，暫設一軍務院於肇慶，直屬於大總統，指揮全國軍事，籌備善後庶政，公推唐繼堯爲撫軍長，岑春煊爲撫軍副長，表示了非要袁下台不可。

在僵局逐漸形成之際，馮國璋隨着活動起來。他看見南北兩政府對峙之局行將出現，企圖聯合未獨立各省造成一種舉足輕重的中間勢力，出而主持和議。他於四月廿五日發出通電說：

滇、黔、粵、桂四省，意見尙持極端，安能開議？計惟籌一提前辦法，先與各省聯絡，各保疆土，共維公安，責任同肩。擴充實力，對於四省與中央，可以左右爲輕重。然後依據法律，審度國情，妥定正當方針，樹立強國根本，再行發言建議，融洽雙方。四省若違衆論，自當視同公敵；政府如有異議，亦當一致爭持。

五月一日馮國璋即提出調停辦法八項（第一項爲承認袁大總統留任），五月五日又親往蚌埠訪倪嗣冲，六日往徐州訪張勳，商定通電各省各派代表一人於五月中赴南京舉行會議。這個會議於十八日開始，劈頭便是總統去留問題，反覆爭持，意見不一。到馮國璋宣佈閉會的時候，也還是毫無結果。

在南京會議中，五月廿二日陳宦忽宣佈四川獨立，廿九日袁世凱宣布帝制案始末，還在企圖繼續武力『戡亂』，同日湯薌銘又宣布湖南獨立，陳宦與湯薌銘本是袁世凱忠實走狗，現在相繼背叛了他。袁世凱自雲南獨立以來原已焦疲困頓，得到這樣絕望的消息，遂一怒而病，延到六月六日，這個以背信棄義獲取權位爲能事的陰謀家，就在他的敵人和同樣一羣不顧信義之徒的圍攻下，極度難堪地死去了。

袁世凱之死，了結了去袁問題的爭執。而無數學步袁世凱的南北大小軍閥就一齊起來，寫下了近代中國歷史上極其黑暗與混亂的一頁。

學 習 與 研 究 叢 刊

『學習與研究叢刊』是和『新知識初步叢刊』『青年自學叢書』，在程度上由淺入深，互相銜接的。自學中的青年，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其適用的讀物。這套叢書也可以做高中或大學同學們的補助讀物。

自然哲學概論

羅克汀著

社會史簡明教程

鄧初民著

簡明中國通史(上)

呂振羽著

研習資本論的準備

沈志遠編

大眾資本論

王右銘著

近代世界政治史

錢亦石著

中國政治史講話

錢亦石著

中國外交史

錢亦石著

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

胡繩著

生 活 書 店 發 行

新世紀叢刊

經過二次大戰後，世界和中國都展開了新的形勢。我們特編這套叢刊，提供最新鮮的材料，爲了解現實所必需的，而且包含着科學的分析，有助於展望將來。

新歐洲

福斯特著 貝遜譯

戰後歐洲的局勢是極堪注目的，尤其因爲那裏誕生了一批新民主的東歐諸國，一種影響深遠的社會各方面新改革正在進行中。而美國獨佔資本則操縱着歐洲的反動勢力。這本十五章的書，不但報告了新歐洲的概況，而且站在美國人民的嚴正立場批評了華爾街的政策，非常值得我們參考。

戰後資本主義經濟之變化

工黨 一年

印尼社會發展概觀

美國大恐慌

戰後美國經濟分析

瓦爾加著
吳清友譯

荷爾著
費孝通譯

王任叔著
斯騰堡著

喬木著
陳原譯

生活書店發行

5133

1945

1
4

1945